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理论学习参考

2021年 第05期

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编

2021年3月8日

【习近平在浙江专题之一】

目 录

习近平在浙江（一）：“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	1
习近平在浙江（二）：“习书记高度重视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	13
习近平在浙江（三）：“‘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习书记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 .	23
习近平在浙江（四）：“习书记大量时间都在基层，和老百姓在一起”	29
习近平在浙江（五）：“习近平同志既重视战略谋划又强调狠抓落实”（上）	37
习近平在浙江（五）：“习近平同志既重视战略谋划又强调狠抓落实”（下）	58

习近平在浙江（一）：“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

《习近平在浙江》反映的主要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委书记的领导工作历程。这段历程，在习近平同志的地方领导实践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作为省委书记全面领导了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工作，更在于他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浙江实际，提出并落实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对浙江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为浙江转型发展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理念和实践准备。

习近平同志在领导浙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创建生态省、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民生实事、加强党的建设等实践中，充分展现了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宏观决策水平、突出的政治驾驭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也充分展现了深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真挚朴实的为民情怀。这组采访实录，通过对当年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直部门和地市领导干部、企业家和基层干部、专家学者和记者等的访谈，为我们做了生动翔实的现场呈现。

采访对象：吕祖善，1946年11月生，浙江诸暨人。1995年7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98年12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2年12月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2003年1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2011年8月起到全国人大任职。2018年9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0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吕省长，您好！您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配合4年多，对他的工作作风和思想理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请您谈谈感受。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来浙江工作的。从那时起，我们在一个班子里工作了将近5年时间。我是省委班子的一员，主要分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是习近平同志在政治、经济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时光荏苒，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10年了，我也已经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了。

这些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有一种浓浓的亲切感，因为他现在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与他当年在浙江带领我们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很多思想和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与他在浙江的实践密不可分。他当年在浙江的探索和实践，不仅成效巨大，而且经过提炼和发展，在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升华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一开始就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调研，到2003年春节前把11个市跑了一遍。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考。2003年7月10日，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浙江经济社会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这就是“八八战略”。

“八八战略”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第一，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第三，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四，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五，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第六，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第八，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习近平同志“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八八战略”第一个“八”所指的“八个优势”，并非单纯指已经体现出来的优势，而是结合实际作出的总体把握，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具体而言，是将已经显现出来的体制机制、产业特色、协调发展、生态、文化等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将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对于一些劣势，要通过努力转化为优势，

或者避开劣势。第二个“八”是指八个方面的举措，是针对进一步发挥、培育和转化优势提出的。通过实施这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

“八八战略”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同志在10多年前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与他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非常吻合的。在“八八战略”里面，习近平同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体现出来。

在当年，“八八战略”是为了浙江实现全面小康而提出的。习近平同志围绕“全面小康”目标，提出了“文化大省”“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人才强省”等一系列的发展要求，从中也反映了小康建设的全面性。在发展理念上，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的均衡和协调。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主持浙江省工作期间，对产业结构转型有哪些先进的理念，以及有哪些与之配套的举措。

吕祖善：21世纪初，我国沿海几个省份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快，特别是广东、江苏、山东跑在前面，我们在有关媒体上也经常听到“浙江要加快增长速度赶上去”的言论。当时我们浙江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四位，对于要不要跟前三位去拼增长速度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跟我谈过几次，他的看法有他独到之处。他说，我们不要跟人家拼增长速度，而是要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下大功夫，一直以来，浙江的协调性和均衡性发展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的特色，要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在这些方面，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定力的。他的思想，与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也是一致的。

当时的浙江，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继续走低成本、低价格、高排放的粗放增长的发展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的时候，供电不足的情况比较普遍，“电荒”时不时就会发生，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为了省电，西湖边的路灯和景观灯隔一个开一个，照明不足，到处都黑黢黢的。农村用电也限得很厉害，有的农村每个星期只有4天供电，还有的地方只能供3天电，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加之老百姓环境意识的增强，浙江

也因为工业污染引发了几起大的群体性事件。

习近平同志把这些问题形象地称为“成长中的烦恼”。他通过调查研究，很明确地提出：浙江要打造先进的制造业基地，要走先进工业化道路，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了，这些粗放、低端、污染的落后产能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淘汰，来下决心去除。他当时提出了“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的理论，指导浙江尽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有三个。

第一，习近平同志指示省政府制定了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省委省政府在2003年6月召开全省工业大会部署这个建设规划，参会的有一万多人。除了主会场，同时还设了视频直播会场。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专门阐述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总要求和总目标，我具体向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过程当中，政府该做什么，企业该做什么。

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两手抓”，即：一手抓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一手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两者并重。这个提法，与现在提出的“动能转换”是异曲同工的。

他还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自主创新和科技创新、坚持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等几个关键点。这些具体要求，一直到现在都在浙江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多年来，尽管遇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和影响，我国的经济在发展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浙江的发展总的来说都是比较稳健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很早就开始起步了，动能转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习近平同志主政下的浙江稳步开展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建设，信息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产生了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一大批科技公司。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浙江不少地方根据自身特点，重点发展服务业。浙江这几年服务业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好，第三产业的份额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了。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地的电子商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动能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抓得早、抓得实，为浙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曾在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过，尽管面临全球经济的困境，但中国的沿海城市相对来讲一直比较平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里的产业

结构转型起步比较早。这其中，我了解最深刻的，自然是习近平同志主政下的浙江。在他的领导下，浙江的动能转换、结构调整、区位优势发挥，都按“八八战略”有序铺开。

第二，根据习近平同志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省政府专门议定了“三大产业带”发展规划，即环杭州湾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发展规划。对这个规划，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他自己参与调研，了解规划所涉及地域的具体情况，在之后整个实施过程中，又多次强调要密切跟踪关注，强调规划实施的效果如何，要看是否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否强化了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第三，为推进“八八战略”和“三大产业带”规划的实施，我们部署了一批大工程、大项目，称为“五大百亿”工程。这“五大百亿”工程，具体包括“百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百亿科教文卫体建设”工程、“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百亿帮扶致富建设”工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在2003—2007年间总投资达3000多亿，这些工程和项目的实施是当时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有效地推动了“八八战略”落地。

习近平同志说：“‘五大百亿’工程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也是造福百姓的工程。”他强调，实施中一定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意识，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真正把这些工程建成惠泽百姓、造福后人的“德政工程”。2003年底，省政府把这“五大百亿”工程细化成具体的项目和任务，并进行了部署。

“五大百亿”工程在当时切实解决了不少浙江发展长期遇到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问题。现在浙江的很多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和水运、空港，电力和能源设施，水利设施，移动通信网络，杭州、宁波、温州高教园区等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就是在那个时候启动的。

省政府又针对软实力建设提出“八大科技创新工程”，包括：先进制造业创新工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工程、生态省和循环经济科技创新工程、科技兴海创新工程、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科技创新工程、服务业科技创新工程、基础研究创新工程、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等。对这些具体工作，习近平同志都亲自听汇报、提要求。在硬环境和软实力两方面，习近平同志不仅对浙江的现实情

况了如指掌，而且对长远规划有着系统要求。我们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具体指示，在各项工作中更好地兼顾浙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

所以，我们政府制定的战略规划，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谋划和实施的。“五大百亿”工程和“八大科技创新工程”紧紧扣住“八八战略”的主题，对产业结构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访组：缩小贫富差距是发展协调性的重要方面。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对浙江的扶贫工作都做了哪些指示和部署。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2002年底，浙江“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如期完成，100多个贫困乡镇全部实现脱贫目标，但那个时候是初步脱贫，也可以说是低水平的脱贫。尽管已经达到了国家的脱贫标准，但这些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全省农民平均水平的40%，不少地方还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水平。针对这个情况，习近平同志在丽水等地调研后，提出“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目标是将原已基本脱贫的100多个乡镇，再加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乡镇，全部列入浙江省欠发达的乡镇，到2007年，80%以上欠发达乡镇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要超过当年全国的平均水平，年均1000元以下收入的人口要少于所在乡镇人口的3%。

习近平同志还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下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根据他的要求部署，浙江省新一轮的脱贫致富攻坚战拉开了序幕，为之后十几年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方面，主要抓了这么几项工作。

首先，推动欠发达地区奔小康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山海协作”。这个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已经提出来的。他来浙江工作以后，继续推动“山海协作”。一些欠发达地区比如山区、海岛，都与发达地区和一些单位结成对子，限期达到奔小康帮扶目标。比如我们省直机关都有帮扶对象，有具体的乡镇，也有帮扶的目标计划。

还有就是搬迁下山异地脱贫。浙江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库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帮扶措施，把很多偏远的自然村进行合并撤并，帮助山上和库区的老百姓转移出来，安置在交通、经济等各方面比较发达的乡镇和县城里，而浙江的县域经济相对又是比较发达的，具备大量吸纳农民工务工和安置的条件。省政府还安排专项资金扶持接纳异地安置农民的乡镇建设“下山脱贫小区”，省财政对下山农户建房给予专项补贴，加上当地政府优惠政策和农村信用社发放贷

款，这样下山农民的房子就能够建起来了。如果家中有个年轻人能够就业务工，家里的经济情况就会有较大改善。

在实施过程中，省委省政府提出搬迁下山异地脱贫要做到“搬得出、安得下、富起来”的要求，每年坚持异地安置5万到6万人，这样稳步而持久地推进下山异地脱贫，成效非常明显。

采访组：对于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战略构想和实践？

吕祖善：关于区域协调，习近平同志有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接轨上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习近平同志来之前，省里面已经有了沪、苏、浙加强协作的构想和初步实践，但仅限于我们常务副省（市）长这个层面的交流。我们每年有一次聚会，协调发展的一些事，这个活动已经搞了几年。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对我说：“祖善，每年常务副省（市）长的聚会还不够，应该提高级别到书记、省（市）长参加的‘长三角峰会’”。我根据他的指示做了通报以后，当时上海和江苏的主要领导都表示赞同，认为这个“峰会”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样，第一次长三角峰会2005年下半年在杭州召开。

习近平同志曾经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接轨上海就是接轨发展，就是接轨国际化和现代化。我们要乘上海之船发展，然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但当时有些同志对长三角一体化还是有些担心，他们担心企业外撤，到长三角的其他省份和城市去发展，会不会造成浙江的产业空心化。习近平同志对这个问题解释得很精辟。他说，企业是否走出去，是从经济规律、企业发展以及市场和资源等各个方面来衡量的。这是全局的意识，也是浙江的责任。

在长三角峰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并提出了一些重点方面的具体设想。比如，交通基础设施联网——公路、铁路、海运、江河运输；环境共治——长江、太湖水、空气等治理；金融一体化——比如银行业；公共服务一体化——比如医保。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重点讲了长三角各地区之间推动产业互补的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是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的重要途径，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首先提出构思并实际推动的战略规划，得到了上海、江苏的赞同和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从这里起步，之后又成为国家战略。后来，国务院制定了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确定长三角为亚太地区的重要门户、世界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着力把长三角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

采访组：生态保护也是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生态省建设上，浙江走在了全国最前列。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期生态省建设。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工作，就开始到各地进行调研，用7个多月时间跑了69个县。有一次，他在和我谈工作的时候就说：“祖善，浙江真是个好地方。在我们手里，要把她保护好，还要发展好。如果能够做到为今后的发展打下扎实基础，那就更好了。”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生态省建设的实践经验。2003年7月，他结合浙江的实际，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省委省政府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发展目标。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句话，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这就把生态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上。接下来，习近平同志对整个浙江省的生态建设提出三个阶段的规划：启动阶段、推进阶段、提高阶段。启动阶段有两年的时间，因为生态省建设首先从环境治理起步，所以启动阶段就要把浙江污染的严重性、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污染源调研清楚，搞清楚污染源在哪里、是什么、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从2006年到2010年是生态建设的推进阶段；从2011年到2030年则是提高阶段。我们省政府制定了相应的“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计划（“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这个计划不是两年三年的计划，而是一个长效机制，浙江要坚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要一以贯之地抓。

浙江河网密布，水自然成了环境整治的重点。省里提出了整治的重点行业：化工、医药、皮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炼、造纸等，涉及这些重点行业的企业有573家，每一家都完全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进行调查，摸清楚基本情况。当时我们提出，监督与建设并举，既要利用现有的条件进行严格的监督，也要建设一批监督环境的基础设施。比如，建设重点水域交界面的自动检测监控设施，在严格检测下，甲流域流给乙流域的是三类水质，乙流域再流给丙流域的就不能是四类，当时这在全国都是很先进的。我们对污水处理厂也都要进行在线监测，可以随时知道处理之后的水是不是达标。我们对县级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进

行实时监测，对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地区也进行了废气的重点监测。

根据以上这些措施，我们提出了“两个基本、两个率先”的要求。“两个基本”是：通过启动推进阶段，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两个率先”是：率先在县以上城市建成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的重点监测网络，要求在 2007 年完成。

“811 环境整治行动计划”是 2003 年 7 月提出的，从 2004 年开始实施。到了 2007 年，“两个基本、两个率先”的要求我们如期达到了。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生态省建设的启动阶段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任务。从 2006 年开始，启动了推进阶段。前面提到的“五大百亿”工程，其中就有一项“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5 年投资 400 多亿，包括万里清水河道建设、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要求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他在 2004 年 1 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在当年 2 月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上，他再一次坚定地表示，浙江要“为全国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当年，他主持制定《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和目标任务作了系统阐述。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而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抓手就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他当时提出，要努力使浙江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他要做的，就是以村庄整治和整理为切入点，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把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把城市的文明向农村辐射，大力推进农村的新社区建设。

城乡一体化的重头戏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也就是农村的路、水、电的建设和垃圾、污水的处理。从 2003 年 6 月开始，我们用 5 年时间，把农民反映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作为突破口，对 10303 个村进行了整治，建成了 1181 个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我们把示范村的经验扩大到全省。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亲自抓工程的部署落实和示范引领，他每年召开一次全省现场

会作现场指导。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后，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直到现在浙江还在抓。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高效生态农业是他首先提出的概念，原来我们讲的是高效农业，因为浙江的土地只种粮食，农民是富不起来的，所以高效被视为重点。习近平同志来浙江以后，提出的高效生态农业，高效和生态都成为了重点。

此外，习近平同志还强调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个村庄搞得好不好，根子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个村庄有了好的基层组织，这个村庄肯定是像模像样的。

现在你们可以到浙江的农村看一看，绝大多数都是干净整洁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精神面貌是非常好的，整个农村有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采访组：浙江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确实非常好，这方面具体有哪些体现呢？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说过，浙江的经济总量不是最高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最快的，但是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是全国最好的。浙江区域之间的差别、城乡发展的差异度是相对最小的。

他说，协调性和均衡性是浙江的优势和特色。事实上，在他主政期间，浙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那时起到现在，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金融危机和经济环境的各种变化，浙江的总体发展还是比较稳健的，虽然速度不是最快的，但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不断提高的，动能转换也在不断推进。

为什么浙江的群体性事件相对其他省份少得多，上访群众也相对少一些？根本的是因为在习近平同志主政时期，浙江的整个经济社会被纳入了一个非常科学的综合配套体系当中。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视察，找我去坐了一会儿，我谈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我说：“‘经济新常态’提得非常正确，现在我们靠什么稳增长？从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投资能拉动需求，但根本的还得靠科技创新、企业的转型升级，不能光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需求，这不能作为常态化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实际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协调性和均衡性，这是他在浙江的一贯主张，与今天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也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期间，他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特点是什么？

吕祖善：我对习近平同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为民情怀。他时时刻刻关心和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我记得，他在跟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浙江尽管总体比较富裕，但还是有贫困的地区，有贫困的群众，我们要多为他们做一些实事。

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强化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作风，他很赞同，对我说：“祖善，为民要重在办事。为民办实事应该形成一个长效机制，而不仅仅是做一两件事。”根据他的交代，我们对于怎么建立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进行了调研。2004年10月，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重点工作领域为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扶贫开发、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社会稳定等10个方面。这十大领域集中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映了群众最直接的呼声，代表了群众最现实的利益。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贫困农村的贫困家庭拿不出孩子念书的钱，习近平同志明确指示：“要让农村的孩子念上书，念好书。不能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因贫失学，也不能让一个贫困大学生失学。”我们于2005年启动了“农村教育四项工程”。第一项工程，是把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所有的书本费、学杂费、代管费等费用全部免掉，浙江是全国最早实行这项规定的。第二项工程，是农村中小学的“爱心营养餐工程”。以前，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住校，吃不起食堂，就自己带一个星期的咸菜，蒸了米饭，配咸菜果腹。我们对这些学生，实行全免费午餐。第三项工程，是学校宿舍的改造工程，以前很多学校宿舍很紧张，学生们睡的高低铺挨在一起，上面睡一个，下面睡两个，拥挤不堪。政府对学生宿舍问题进行了重点解决，使农村小孩也能享受优质的资源。第四项工程，是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3年内完成17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

在调研中，我们对农村的医疗情况也进行了统计，农民看不起病、看病不方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非典”以后，农村加强公共卫生成为当务之急，医疗制度改革也使得农村的公共卫生设施得到很大提升。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做到三件事：一是农民看得起病；二是农民有地方看病；三是农民加强预防少生病。我们

把这三句话作为“农民健康工程”的基本目标。从2004年开始，做到了农民享有基本卫生服务，农村重点人群享有重点医疗服务，并使浙江的农民每两年都可以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当时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省委省政府决策建立全省的“大社保体系”，目标是为广大群众系上一个保障基本生活的安全带，以此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基本内容。大社保体系，要求做到城乡所有人群全覆盖，并做到了“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要求。自此，浙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提出大社保体系规划的省份。浙江率先出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镇职工、农村企业职工、农民工，率先将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职工养老保险的范畴。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浙江还率先建设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制度最早是城市居民有保障，农民是没有的。同时还率先实施了孤寡老人的集中供养，政府拿钱，在农村建设养老院，供养那些贫困的、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通过这些措施，浙江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上种种举措，就是习近平同志为民情怀的集中体现。

总起来说，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的这几年，是浙江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同时，他也为浙江的长远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益的东西，也度过了一段很难忘的岁月。他的执政理念和思想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即使是他离开浙江以后，我做任何工作，遇到任何问题，马上就会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对这方面的问题当年是怎么交代的，于是我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一直在讲，我很幸运，我在省里工作很长时间，先后碰到几位好班长，特别是习近平同志的言传身教，他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方法、战略的眼光，带给我很大教益。

这几年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感到特别亲切，这是因为当年他交代的很多事情，里面所蕴含的理念，与今天他治国理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同志，就经常回忆起他当年在浙江带领我们奋斗的那段岁月。在他的带领下，我做了一点具体工作，做成了一些事情，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

（来源：学习时报，2021-03-01）

习近平在浙江（二）：“习书记高度重视政协履行 职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采访对象：李金明，1941年8月生，河南南阳人。1998年12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2000年4月任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2003年1月任省政协主席。2007年2月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7日，2020年7月7日核访

采访地点：杭州市新侨饭店

采访组：李金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您和他一起共事将近5年时间，可以说见证了他主政浙江方方面面工作的整个过程。

李金明：确实如此。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来浙江工作，我当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有幸在习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2003年1月，我到省政协工作，省委、省纪委的工作还继续做了一段时间，因此跟他汇报、请示工作的机会是比较的。他带领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让我难以忘怀。他坚定的理想信念、深邃的战略思想、丰富的政治智慧、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向习书记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

采访组：首先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任省委书记期间开展党建工作的具体情况。

李金明：习书记对党建工作非常重视。2003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专门研究部署党的建设工作，作出了《关于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决定》。2004年10月，在他的领导下，省委全会又提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2005年1月，他系统部署了全省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短短几个月就构建了党建工作的整体框架和具体部署，这一系列谋划彰显了党建工作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力推动了全省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习书记把党中央的精神同浙江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提出党的建设要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展开，努力做到“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个本领”的创新

理念。这是对党建工作全面系统的深化，也是做好党建工作的最好平台和载体。自此，党建工作中抓基础、强本领的“八八部署”，同全局工作的“八八战略”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习书记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要求各级党委形成学习制度，做到学以致用。省委一班人坚持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化，习书记要求要在真学、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做到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推进“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他在2003年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八八战略”。后来，他又先后做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生态省建设”等一系列带有纲领性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是如何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有哪些特点？

李金明：习书记刚调来浙江工作时，我是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有一次，我到中央纪委汇报工作时，中央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谈起习书记在福建工作的情况时说：“福建有些事情很复杂，但习近平同志很清醒。”他还不停地称赞习书记“过硬”“不简单”。

在主持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坚定做到“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有力指导了浙江的反腐败斗争。我在担任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期间，有较多机会向习书记请示和汇报工作。有一次，我在汇报工作中讲到一些案件，向他反映一个情况：有的同志认为，习书记刚刚到省委工作，有的案件是不是缓一点办？他听到这个话后就严肃地说：“不能因为我初来乍到，该办的就不办了，该抓的就不抓了。该怎么查就怎么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总之，工作不能停顿。我们就是要做到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

在后来的反腐败工作讲话中，习书记多次重申“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的观点和要求，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重要指示，有力地指导了省里的纪检监察工作，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深得民心。在他的坚强领导下，浙江省委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加大反腐倡廉工作力度，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与他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反腐败思想。

党中央史无前例的“打虎、拍蝇、猎狐”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极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使我们党跨过了一个大坎，渡过了一个大险滩，可以说是在和平时期挽救了党。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领导反腐工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对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习书记对纪委工作十分关心。举两个例子来说吧。其一，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案件，习书记亲自召开会议研究，及时做出指示：“人虽然跑了，案件还要坚决查。”省大案要案协调小组根据习书记的要求，及时组织了有关方面的力量，对杨秀珠进行了立案调查，为后来公安部对杨秀珠发出红色通缉令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其二，中央纪委在查处浙江省原副省长王某的案件时，调查组的工作曾一度受到某些干扰。习书记态度坚定地指示：“要坚决按中央纪委的要求办。”及时排除了干扰，有力地支持了纪检监察工作，保证了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严惩了腐败分子。

二是从制度入手，坚持标本兼治。习书记对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极为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具体研究。他指出，要构建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浙江特色、有较强操作性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权力制约、监督管理、法纪约束、测评预警、廉政激励等机制。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把教育、监督、预防、惩治等多项制度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使浙江反腐倡廉的实践成果及时转化为制度资源，从制度上促进和推动了浙江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2003年7月，浙江省委在全国最早出台了反腐倡廉惩防体系文件，走在了全国前列，受到中央纪委的充分肯定。

三是从教育入手，算好“三笔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道德底线。习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十分关心和爱护，多次谆谆告诫干部：“要慎初、慎独，始终保持清醒。”他说，“高压线”碰不得，“警戒线”闯不得。在运用权力和交往活动中，要仔细算好“三笔账”：一是利益账，坚持正确的利益原则。二是算好法纪账，坚持法纪原则。三是算好良心账，坚持良知原则。这三笔账，划出了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他还要求各级党委、纪委对党员干部“多提醒、多敲警钟、多打招呼”，要做好“咬耳朵、扯袖子”的工作，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最大限度降低了腐败发生率。

采访组：您 2003 年 1 月到省政协工作，对习近平同志关心和领导政协工作的情况十分清楚。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李金明：习书记高度关心政协工作。2004 年 1 月 14 日，他在听取省政协党组汇报时指出：“最近，我同民主党派座谈中，深切感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还强调，处理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宪法和政协章程为依据，努力把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习书记在领导政协工作的实践中，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我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保证政协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习书记主持浙江工作期间，鲜明提出“一个核心、三个党组、几个口子”的重要理念，并在全局工作中进一步规范了党委对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关系。习书记曾在多次会议上，就党在政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协工作的作用、指导思想、基本要求、遵循的原则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2004 年 12 月 28 日，他在省政协常委会上指出：“按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完善‘一个核心、三个党组、几个口子’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政协党组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要坚持在这样的领导体制下开展工作，主动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切实履行省委赋予的职责。”省政协党组作为省委的派出机构，每年都要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一次或几次工作，自觉接受省委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和支持，认真领会和贯彻省委的决策意图，切实履行省委赋予的职责。政协委员中的共产党员，作为政协中的一个重要界别，也都在认真履行职责中起到应有作用。每年召开政协全体会议，委员中的中共党员都要专门开会，并成立临时党支部，体现党在政协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二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必须遵循的原则。根据“八八战略”的具体要求，习书记每年都针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亲自给省政协出题目、交任务，调研课题内容很多，涉及面也很广。比如，2004 年 1 月 14 日，省委常委会听取省政协党组工作汇报后，习书记在认真思考基础上，给省政协提出两个调研题目，即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和城乡统筹发展。之所以出这样两个题目，第一个是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浙江如何加快推进，这是个难题，需要认真研究；第二个是浙江统

筹城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如何进一步深化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也需要深入研究。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浙江发展中迫切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也是习书记十分关注并且准备重点抓的课题。习书记不仅提出问题，还亲自带领省政协相关课题组的同志进行调研，专门听取课题组汇报，并要求相关部门认真吸取省政协课题组提出的政策建议。

在习书记支持鼓励下，省政协履职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我们不仅认真完成省委交办的重大调研任务，还坚持同步跟踪调研与超前研究相结合，在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开展论证性、对策性调研，进一步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同时，还注重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趋势性、前沿性问题和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超前研究，提出针对性、前瞻性的意见建议。比如，2003年，省委交给省政协两个重点调研课题：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加快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省政协常委会坚持从政协特点和优势出发，以提高党委、政府决策采纳率为目地，深入开展调研，较好完成了这两项调研任务。调研成果得到习书记的批示和肯定，一些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同时，省政协还结合当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先天不足”和“成长烦恼”，主动开展包括“山上浙江”“海上浙江”“生态浙江”“人文浙江”等“系列浙江”调研，为省委省政府制定相关战略建言献策。

我们每年还根据习书记提出的题目，组织政协委员特别是政协常委搞专项集体民主监督。这样一来，打消了个人顾虑，而且声势大、力度大、效果好。2004年9月，习书记在全省政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坚持服务、配合、支持的原则，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参与中支持，在支持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真心诚意地帮助党政机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他要求从制度上加强政协民主监督工作。在习书记直接主持下，2004年，省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协履行职能“三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对政协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做出了规定。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加强民主监督交办事项责任追究制，对该办不办的，政协可要求承办单位说明情况；对该办未办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要追究有关承办单位的责任；对抵制或阻挠民主监督甚至打击报复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这样，通过制定“三化”制度，建立长效机制，强化了民主监督这个薄弱环节，形成了政协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有关方面乐于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局面。此后，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省政协每年

都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取得了显著效果。

三是扩大团结面，增强凝聚力，把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到党的中心工作上来。习书记要求政协要做到凝心聚力，还要察民情、知民意、解民忧，指示政协要充分利用在反映社情民意方面的重要信息渠道作用，使党委政府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为此，省政协还专门设立了民情热线、听证会，群众代表旁听省政协常委会议，在浙江经视频道开设《政协视线》栏目。习书记对省政协听证会的作用做出重要批示：“听证会在扩大民主方面无疑是个方向，广开言路，兼听则明，让老百姓登堂入室，可以了解实情，听到真实的声音。而且，我们政府有的政策，就是通过听证得到了调整，更加符合实际。特别是关乎民生的问题，召开听证会，主动听一听群众的反映，可对制定政策提供一些参考依据。有些问题，老百姓本来就是要反映的，但没有反映的渠道，视情让他们在一定场合反映，有组织地反映，这就是有序地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省政协坚持“围绕核心、服务中心、反映民心、合力同心”发挥作用，为党委、政府分忧，为广大群众解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四是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具体指导。习书记对政协工作高度重视，不仅在领导政协工作中提出很多重要思想，有力地指导了政协工作。同时，对政协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他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及时予以帮助解决，推动了政协事业的不断发展。

在我担任省政协主席的4年多时间里，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要求，密切结合浙江实际，先后下发了4个有关政协工作的文件。在每个文件制定之前，习书记都要求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和实际进行调研，摸清基本情况，总结好的做法，找出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省委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出台文件。

习书记对一年一度的省政协全体会议高度重视，每次对省政协的工作都做出重要指示，布置重要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在每年政协全体大会闭幕式上，习书记都要发表重要讲话。省政协全体会议期间，他要求省委常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政协小组会议、联组会议，听取委员发言。闭会期间，他多次参加省政协常委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介绍省委重

要工作，对政协工作提出要求。

习书记十分重视政协的自身建设。他要求把省政协真正建设成“学习型、研究型、服务型”组织，更好地为省委的中心工作服务。他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都十分关心和重视，对他们搞好政治交接、思想传承、工作延续和传统发扬提出具体要求，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发挥了应有作用。在每次听取省政协党组汇报后的讲话，以及在省政协常委会议和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书记都强调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要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他多次指出：“政协是一线，不是二线。”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一起共事近5年时间，请您谈谈对他的工作作风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李金明：我同习书记共事相处，只有短短5年时间，我受益匪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大力弘扬革命传统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和习书记的接触中，除了工作之外，他多次谈到过红船精神、延安精神、陕甘宁边区、深圳经济特区等。从过去的革命历程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从井冈山说到延安，再说到深圳。大跨度的漫长历史时空，连接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红线，使我受到了深刻的革命精神和改革精神教育。我们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充满了敬仰和热爱，他们永远激励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命青春，使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褪色。习近平同志身上的红色基因和改革创新精神，真正体现了他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强引领者和忠诚实践者。2005年6月21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对于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先进性，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作风。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心系群众，关注民生，低调务实，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到群众中去，接地气、摸实情，调研和指导工作。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还有一片海，是一个山区和海岛为主的省份，习书记特别注重到那些交通不便的山区、矿山、海岛检查指导工作，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他去得更多。他联系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淳安县的下姜村，一去就在村里住上几天，走村串户，同群众促膝谈心，深受干部群众的拥戴。我在浙江工作20多年，有些他去过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浙江又是一个台风、水灾、地质灾害频发的

省份。灾害发生时，习书记不顾安危和辛劳，常常出现在抗灾救灾的第一线。他不怕脏累苦险，深入到长广煤矿几百米深的井下，逐个查看采煤工作面，慰问井下工人，使工人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求真务实，带动各级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全面推动了浙江各项工作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三是教育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工作中有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的干部，习书记特别注意对他们进行正确政绩观的教育。一位市里的主要领导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习书记和他谈话时讲到，有的干部特别重视GDP，GDP搞上去了，好像很有成就感，但老百姓不这么看。群众关注更多的是，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安全不安全，环境好不好。我们要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大事。他说，习书记的这段谈话，使他很受教育。其实，习书记在跟我的谈话过程中，还有在其他的一些场合，都多次讲过同样内容的话，这对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帮助和教育作用。习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多做铺垫和打基础的工作”，他反复告诫大家“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善作善成，久久为功”，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好人民的公仆。在习书记的谆谆教导下，浙江各级干部成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带头人，使浙江的许多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四是胸怀全局，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时，心系中西部贫困地区，对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对口扶贫工作非常重视。他来浙江工作不久，在百忙中亲自带领各地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到四川省和重庆市指导对口扶贫工作，我作为省政协主席也陪同习近平同志参与了此项活动。我们先后来到了成都市、广元市、南充市、涪陵地区，以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和邓小平的家乡瞻仰和考察，在邓小平和朱德的故居我们还栽种了浙江纪念林。同四川省和重庆市对接了产业扶贫项目，看望了浙商，签约了两省市扶贫合作项目，援建了希望小学，并考察了在那里扶贫的杭州娃哈哈广元和涪陵分公司。在结束川渝扶贫考察之后，我们连夜飞抵湖北宜昌，又考察了长江三峡大坝和库区移民工作，并在武汉签署了800多个浙江同湖北的合作项目，有力支持了湖北的发展，这一举措深受湖北人民的欢迎和赞誉。这种自身资源同外地资源相结合所产生的裂变效应，带动一大批浙江企业纷纷走向全国，支持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给予了雪中

送炭的帮助，带动了当地多种行业的发展。同时这种双方资源优势的最佳结合方式，被习近平同志总结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浙江经验，使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同全国多地广泛合作，形成了遍地开花结果的良好态势，助推了脱贫致富工作，促进了共同富裕奔小康的发展步伐。

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非常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他多次深情地说：“东部地区应该对中西部地区多关心，多支持，多帮助，多交流，我们要携手共同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04年初，河南省一个市的党政考察团来浙江考察乡镇企业，习书记在百忙之中破格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与会同志深受教育，感动不已。在安排河南考察团的行程时，恰好第二天省委要召开乡镇企业会议，习书记还要作重要讲话。我请示后，习书记同意河南考察团的同志旁听大会，帮助他们了解浙江的工作情况。考察团带队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当天晚上对习书记的报告讨论到深夜，大家激动不已。考察团中的大多数成员是基层干部，他们说：“习书记平易近人，讲话又那么实在中肯，让我们非常感动，这次考察的收获很大，回去得好好地运用到工作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始终严以律己、平易近人。请讲讲您了解的这方面的故事。

李金明：习书记严以律己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堪称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干部，都深受教育。

习书记对家人的要求特别严格。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老伴听说彭丽媛同志来杭州探亲，就商量着一起去习书记家看看。当时，习书记不在家，彭丽媛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交谈中，她讲到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她去那里探亲的艰辛情况。其中就提到，习书记在宁德地委工作时，她去宁德很不方便，从北京乘飞机到福州机场，然后从机场坐大巴到福州市汽车站，再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宁德。有一次，她背了一个大棉被乘坐长途汽车，上下车都很困难，但她知道习书记工作忙，硬是没有给他打电话要求接一下。后来，习书记到福州工作，她经常要一个人带着女儿奔波于北京与福州两地，这其中的甘苦与艰辛，我们听了很受感动。现在想一想，彭丽媛同志既是一位人民喜爱的艺术家，又是领导干部的家属，到机场、车站没人接送，自己多次转车，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出行，没有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可见，习书记对家人的要求多么严格，彭丽媛同志又是多么朴实律己！

有一次，习书记的弟弟习近平和我通电话时，我说：“我们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见过面，到现在快 20 年没有见面了，欢迎你有机会来杭州聚聚，看看诗画江南。”习近平回答说：“我哥不让我去啊！”2003 年，我到深圳参加浙籍港澳同胞联谊会，得知习书记的母亲齐心老人在深圳，我们就去看望她老人家。当时，习书记的姐姐桥桥也在场，我就跟她说：“欢迎你们到浙江走一走，看看浙江的大变化。”她说：“我们也很想去，就是不知道近平让不让去呀。”

从日常言谈中和不经意的细节里，我们深刻感受到，习书记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习书记和他的家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对广大干部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习书记平易近人，亲和力很强。2007 年 3 月，习书记调上海工作前夕，在交接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同志。他亲临我家看望辞行，我和老伴儿都十分感动。在交谈中，他和我们拉家常，问寒问暖，还亲切地说道：“以后你们老同志到上海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朴实无华的语言，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老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之情。他还十分谦虚地说：“我到上海工作要注意些什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到中央工作后，身居高位，日理万机，依然关心和关注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都十分感动和感谢。

习书记勤政为民的务实作风，严以律己的品格，平易近人的亲和力，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有深切感受。他的领袖风范、政治品格、人格魅力和亲民作风，在浙江大地广为传诵。我深信，他的风范、品质、魅力和作风必将影响和带动全国广大干部群众，为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学习时报，2021-03-01）

习近平在浙江（三）：“‘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习书记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

采访对象：周国富，1945年7月生，浙江诸暨人。1998年12月至2007年4月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其间，1998年12月至2003年12月兼任省政法委书记，2003年7月至2006年11月兼任省纪委书记。2007年2月至2011年1月任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11年3月至2018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2018年8月退休。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也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8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周国富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2002年到浙江任职时，浙江当时的省情是怎样的？面临哪些问题？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周国富：浙江是一个陆域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万多平方公里的沿海省份，陆域面积中山区占70%左右，被称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多地少资源能源匮乏，人们常说，“浙江人倒霉，就倒在没有煤”。同时，浙江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大的国有工业企业，1953年至1957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大项目中，没有一个落户浙江。加上1962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浙江地处沿海前线，一些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也搞不了，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经济社会情况与全国大多数省份差不多，甚至比其他省份还要更困难一些。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人文优势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贯彻实施激发出来、凸显出来，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也面临不少“成长的烦恼”。比如，习书记2002年10月到浙江任职时，民营经济已经占据浙江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称作“三分天下有其二”。我曾把浙江的经济情况归纳为“老天爷经济、老祖宗经济、老百姓经济”。“老天爷经济”是指浙江具有沿海区位优势；“老祖宗经济”是指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积淀较为深厚；“老百姓经济”就是指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但浙江的民营经济也有着先天的不足——这些民营经济大多是从乡镇企业转制和个体私营经济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科技水平较低、企业规模较小、分布较散、实力较弱，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这种现象初起时被叫作“村村点火、乡乡冒烟”，这是对当时浙江民营经济“低、小、散、弱”情况的形象描述。同时，从全省情况看，民营企业虽然有了大的发展，但还不可能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浙江经济又是以民营企业为主，所以浙江的干部和民营企业家普遍感到发展底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需要对浙江经济的发展理念和路径进行认真梳理和思考，找到新的发展思路和方位。如何加快实现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壮大发展浙江经济，成了摆在习书记面前的一道难题。

习书记到浙江以后，先是俯下身子扎实开展调研，然后基于对浙江省情的了解提出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新的工作坐标。走在前列是目标，干在实处是关键。这让大家耳目一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创新创业中秉持的奋进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对今后工作的明确要求，极大提升了浙江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格，一个省有一个省的省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人格，“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就是我们浙江的省格，是浙江发展的精气神。同时，更是习书记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集中体现。

在 2003 年 7 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八八战略”。“八八战略”，八大优势，八大举措，针对浙江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主客观条件，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针对浙江独特的地理位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他还把民营经济发展经历的“走过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纳入浙江人文优势的内容，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等等。

“八八战略”是习书记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全面、系统、贴切、务实，每条优势和举措都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所以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同。不仅为浙江未来发展明确了方位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使浙江 4000 多万人民提振了发展的信心。至今，“八八战略”依然是指导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领、大战略和原动力。

采访组：具体来讲，习近平同志是怎样将“八八战略”落到实处的？

周国富：习书记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新抓手，将“八八战略”落到实处。概括地说，有“七个两”，即“两只鸟”、“两座山”、“两种人”、“两个治”、“两只手”、“两个优势”、“两个发展”等。

“两只鸟”。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较早，基础薄弱，“低小散弱”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了加快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转型升级，习书记提出了“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的“两鸟”重要论断，促进了思想的再解放，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步伐，引导浙江经济科学发展、品质发展和提升发展。

“两座山”。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域特点，发展不够平衡，粗放发展，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山区发展与平原发展、长远发展与眼前发展等诸多矛盾，制约着浙江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容量。就农村来说，当时有顺口溜说：“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是农村”；“在家穿拖鞋，出门穿套鞋”；“浙江到，汽车跳”。这说明村镇建设缺乏规划、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破坏、城乡发展不平衡。2003年，在习书记的领导下，省委决定在农村全面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2005年8月15日，习书记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调研中提出著名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为正在开展的“千万工程”和整个浙江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理念和指导方针。习书记亲力亲为，每年主持召开由各市市委书记和省级有关厅局长与会的农村“千万工程”现场会，进行经验交流和工作部署，脚踏实地，步步推进，形成市县书记和机关厅局长共抓齐干的大气势。同时，在“千万工程”推进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如实施乡村通路工程、万里清水河道工程、乡村规划和民居保护设计工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程、下山脱贫和千万农民培训工程等。通过十几年持之以恒的奋发创新，浙江农村呈现了一大批美丽乡村和农（渔）家乐等“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新景象，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村美了，农业产业“接二连三”，乡村旅游休闲成为新兴产业，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山区农民说，过去是“砍树”卖“木头”赚钱，现在是“看树”卖“美景”致富。“砍”与“看”一字之变，深刻反映了浙江“三农”面貌所发生的根本变化。

“两种人”。落实“八八战略”，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处理好“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平原与山区”“陆地与海岛”的均衡发展至关重要。习书记提出并主抓“生态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山海协作”等，进一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市文明辐射到农村，也让农村文明辐射到城市，农民进城务工，市民下乡旅游休闲并创业，不仅密切了城乡关系，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市民与农民的共同富裕、均衡发展。至今，浙江一直是全国城市农村、市民农民发展差异、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省份。

“两个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我国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是以一次又一次冲破思想禁锢为前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群众迸发出蕴藏着的极大创造力。习书记提出的“无为而治”“有为善治”的“两治”思想，意义重大。习书记十分重视老百姓为发展生产力所创造的新事物、新作为，积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和创造。同时，对于政府有法制和政策规定并已经清楚明了的事情，就要敢于和善于去治理。如习书记主抓的“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平安浙江”等系列建设，为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两只手”。习书记善于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发展经济。创立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对发展城乡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富裕农民作出过重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村供销合作社渐渐偏离了为农民服务的宗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出现了诸多问题。习书记对浙江供销合作社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研，并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重新明确了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目标任务、改革重点和发展方向，特别强调供销合作社要为农民、农村和农业服务。他还亲自签发浙江省委〔2006〕106号文件，即《关于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新农村建设中重要作用的意见》。同年，习书记在温州瑞安市农村供销合作社“三位一体”工作现场会上，首次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此后，全国首家集生产、供销、信用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温州市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随后，在浙江省18个县（市、区）展开试点，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果。

“两个优势、两个发展”。充分发挥浙江的“市场优势、浙商优势”，“跳

出浙江发展浙江”、“走出去融合发展浙江”，是习书记抓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浙江人多地少，资源能源匮乏，发展容量和空间不大。但浙江有市场先发优势和特有的浙商优势。浙江在海外有众多华侨、华人、华商，在国内各省都有浙商和商会。至今，浙商在省外已超过600多万，在海外也有200多万。浙商富有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坚韧不拔、创业创新的浙江精神，跳出去、走出去，发展浙江、发展全国、造福人民就是更高层次、更高站位的发展观。习书记每到省外和国外考察，都要去看望浙商、勉励浙商，听取意见，指导工作，使浙商备受鼓舞。“两个优势、两个发展”的大发展思想，不仅促进了浙江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浙江的企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获得了丰硕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您曾分管过纪检监察工作，请您谈谈他是怎样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

周国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经济先发之地，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党员、干部确实面临很多诱惑和严峻考验。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是靠“手榴弹”“炸”出来的，意思是经常拎着酒瓶请客喝酒；是靠“机关枪”“扫”出来的，意思是见了人就分发香烟联络感情；是靠牛皮“吹”出来的，意思是磨破嘴皮推销产品。习书记很理解民营企业家创业的艰辛和难处，他常说：我们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很不容易，党和政府一定不能瞧不起他们，要亲近他们，给他们支持。同时，习书记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他也非常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在反腐败斗争中，特别强调惩防并重，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对于违纪违法的党员和干部，从来都是态度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片。

在大力惩治腐败的同时，习书记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全社会的廉政教育，教育党员干部算清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在习书记的重视和支持下，浙江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省。省纪委专门编纂了一部《廉政镜鉴丛书》，分为《从政风范》《从政警戒》《古今廉文》《清官故事》《中国廉政史话》《廉政文化新探》等六册，由习书记亲自作序，作为党员干部读本，并公开发行。宁波市鄞州区委编纂的《中国廉政文化丛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在全省各地还建立17个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同时还在全省开展廉政文化进街道、社区、农村和学校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副书记刘峰岩的赞扬和推广。我曾经到杭州市区一所初中听过

一堂“廉政文化教育课”，主题是“诱惑”，讨论什么是诱惑？我们身边有哪些诱惑？怎样对待诱惑？学生们讨论热烈，老师循循善诱，分析透彻，取得良好效果，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清廉”的种子。做好教育为上、惩防结合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为浙江党员、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社会环境，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这是习书记率先垂范，敢抓、善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丰硕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周国富：习书记是一位拥有大智慧、大谋略、大抱负、大实干的杰出领导者。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非常低调，始终扎实实地干好每一项工作。他认真负责，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注重调查研究，讲求工作效率。在我们心中，他既是我们的班长，也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大家知道，我们浙江是世界闻名的产茶之乡，习书记爱茶、关心茶，支持浙江茶产业的发展。2006年，还专门给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所属刊物《茶博览》撰写《世界茶乡看浙江》的文章，给浙江茶人以极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我觉得他做人如茶。茶叶在其生命最美好的时候（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被采摘离开了生命之母（树），经历凋、揉、烘、焙甚至发酵等艰苦磨炼方成好茶。这正是习书记的人生经历和奉献成就的生动写照，也是他“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和精彩体现。习书记阅历丰富，胆识过人，身体力行，无私奉献。可以说，当年主政浙江时的探索和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源头活水。

（来源：学习时报，2021-03-03）

习近平在浙江（四）：“习书记大量时间都在基层，和老百姓在一起”

采访对象：章猛进，1946年10月生，浙江余姚人。1998年1月任浙江省副省长。2003年5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7年2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7年3月任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7年6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10年10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8日

采访地点：杭州大华饭店

采访组：章猛进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您和他先后在省政府、省委同一个班子，请您讲讲你们认识的过程，以及他制定浙江发展战略的情况。

章猛进：习书记从福建到浙江工作，出席浙江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并作任职讲话，是2002年10月12日，职务是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我当时是副省长，分管农业，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一个多月后，中央文件宣布他接任浙江省委书记，同时也公布我进省委常委，任常务副省长。我在省委、省政府都有职务，所以和他工作上的直接接触就比较多。在最初接触中，我发现习书记待人很诚恳，说话办事很稳重，工作很严谨，很注重调研。

我们两个人在工作上接触多，平时下乡调研在一起相处的机会也多，经常在一起聊天、交流工作。他曾把他的一本著作《关于农业农村工作调研》送给我，并在扉页上写了字：请章猛进同志指正。在共事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始终做到了配合默契、相互支持。

平时开会讲话也好，工作时展现出来的工作思路也好，他一直都很有战略高度，有宏观思维。他看问题看得比较远，有长远规划，有大局观。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八八战略”。

“八八战略”全面总结了浙江省八个方面的优势和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我们就“八八战略”反复学习讨论，最终形成全省的发展蓝图，并一项一项推进落实，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浙江没有走弯路，经济发展一

直又稳又快，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习书记的“八八战略”有效引领了浙江这么多年的发展，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

采访组：请您举几个事例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当时开展的一些具体工作。

章猛进：我结合自己曾经分管的工作，谈两个印象深刻的方面。

第一，习书记在土地的整合、利用和规划等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人多地少，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进入21世纪，房子要建，高速公路也要建，飞机场也要扩建，没有土地怎么办？习书记当时就提出，要充分利用和开发山坡地、海边地，但要经过环保部门的评估和批准，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开发。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之后，土地紧张的问题得到很大缓解。

习书记还提出，要与兄弟省份开展合作，首先是把黑龙江的粮食运过来，保证浙江粮食市场的供应。要允许黑龙江来浙江办粮食一条街，允许把我们的粮仓租给他们。习书记还要我们帮助黑龙江发展经济，让我带企业家去落实。我先后到黑龙江去了6次，与当地建立起了长效合作机制，保证了浙江粮食供应的稳定，缓解了浙江土地紧张的压力。

在城市的土地整合与规划方面，习书记也通过国企改革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杭州市的土地压力很大，环保压力也很大，他提出“腾笼换鸟”的办法，把很多污染企业迁到城市外面去，严格按照环保标准进行新的规划建设。这样，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把宝贵的城市土地腾了出来，可以建设公园、绿地、体育设施等等，给市民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同时，工业摆在城市之外广阔的地域，可以更新设备，加强技术改造，使企业更加健康快速发展。现在杭州市这么漂亮，跟他当时做的工作有很大关系。

第二，在农村工作方面，习书记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

习近平同志非常关注浙江农村的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他在安吉、丽水等地调研时，发现农村的卫生环境很差，污染很严重，就专门提出来整治环境的问题。此后，他积极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这成为浙江省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后来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思想和实践基础。他十分支持省里安排科技特派员

到农村去。我省每年派 100 多名科技人员下乡，帮助农民科学种田、开发山区，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他积极推动“山海协作”，十分重视对贫困山区的精准扶贫。他经常到贫困山区调研，我还跟他去过几次。他的调研很深入，我记得他曾到过丽水市最困难、最穷的山沟深处，道路很危险。我们还跟他到过丽水市的最大扶贫项目滩坑水库坝址。他亲自协调这个项目，实际投资 60 多亿元，库容 41.9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 60.4 万千瓦，移民 5.3 万人，前三年平均利润达 2 亿元，扶贫效果十分明显。在深入调研之后，他了解了山区的具体情况和紧迫任务，强调推动“山海协作”的重要性。“山海协作”中的“山”指的是贫困山区，“海”指的是沿海县市，“山”和“海”之间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他主张把它们衔接起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当时，他几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和“海”，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指导意见。直到现在，“山海协作”还在发挥着作用。

在开展“山海协作”的同时，他还把省级机关的厅局同各个贫困山区的乡村结合起来，进行对口帮扶。这样一来，贫困山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机关干部为民服务意识大大加强，各尽所能开展帮扶。由此，贫困山区得到了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采访组：在各地各个层级的领导岗位上，习近平同志都非常注重创新。请谈几个您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

章猛进：习书记很有创新精神，在不同领导岗位上都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我想着重谈谈他对浙江国有企业改革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一个既十分重要又困难重重的问题。我调研发现，国有企业存在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问题，都很棘手，事情也很复杂，改革起来确实很难。习书记提出来：在工作方法上，首先不要搞“一刀切”，要实行“一企一策”，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个要求，使我们开了窍，开动脑筋针对每个企业的实际去想改革的办法。

习书记特别实事求是，从不会来虚的那一套。我曾跟他到过几个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一起开座谈会，在会上当场就深入分析问题之所在，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而不是“务虚”。在他的直接关心下，浙江有几家涉及交通、能源、商业、外贸的国有企业发展得都很好。

习书记的思路很开阔，方法也很灵活，有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并了，还

有的卖给民营企业了，他都很支持，不会“包办”，也不会搞“一刀切”，而是让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改革方式。在习书记指示下，我们通常会提出几个方案给企业自己选择决定。但前提是两条：第一，一定要保证所有职工的生活，保证他们有工作做；第二，国有资产不能流失。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式，这两条基本原则都要坚持好。只要国家利益不受损失，民营企业又能有所发展，职工不下岗，政府何乐而不为呢？得益于习书记提出的这两个原则，浙江国企改革中职工安置问题都解决得很好。

2004年，习书记还提出，企业要有“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发展思维。该产业升级、推进技改的，就要毫不犹豫地上；该挪走的，就要挪走。在这个思想指引下，不光很多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下面的很多乡镇企业也进行了改革。

在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方面，习书记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我们有很多省级企业在宁波，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税收是归宁波还是归省里？省里在宁波单独设立税务机构，当时有很多关系没有处理好。习书记提出，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后来，在他的指导下，大家讨论决定，在宁波的企业每年上缴一定数额给省里，并且每年都要递增5%，而这些企业所创造的GDP和税收都给宁波，我们税务部门全部撤回到省里来。这样，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都没有受到损害。

再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经达到了国际化水平，习书记经过调研认为，这个地方的市场规模这么大，但地方的管理水平跟不上，就如同小孩子管大市场，有点力不从心。他就提出来，要对义乌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让义乌有更大的能力来管理好、发展好小商品市场。当时，我去做具体的执行工作。省政府赋予义乌相当于地市级的权力，义乌的县委书记由金华的市委常委兼任，义乌的县长由金华市的副市长兼任。县里本来是不能设立市级银行和海关的，但我们把这个权力都下放给义乌市。后来，义乌银行、海关都有了，大大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主张做工作就要“沉下去”，不仅要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还要始终心系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请您谈一谈他下乡调研的情况吧。

章猛进：习书记非常注重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他的战略谋划都来自于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他经常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一有机会就往乡下跑，一有空就去调研。我同他一起到过很多地方调研。

习书记每到一个市、一个县，一定会找来当地的地方志仔细阅读。开座谈会的时候，市县的领导谈得更多的是土地、GDP，而他会先从当地的名人、文化、历史谈起，首先挖掘出当地的文化内涵、地理特点、风土人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谈产业、谈发展，这样的发展才能有特点、有定位、有主旨，不会造成毫无特色的“千篇一律”式的发展。

习书记平时掌握的情况比较多，给他汇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讲假话、大话、空话，因为这些都糊弄不了他。这里面体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心系群众，把工作抓在实处。

他去丽水调研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时，发现云和县的很多农民由于家庭贫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文化素质不高，收入也不高。他当时就觉得，对这些小孩子，还是要让他们多读点书，以后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调研回来以后，他就和省里商量，最终决定给这些贫困地区的小孩子提供免费的中专教育，凡是农民子女读农林院校的政府就给予补助，还免费给农村发放农业科普方面的书籍。通过这些举措，培养当地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习书记青少年时代曾经在极度贫困的黄土高原当过知青，他和穷苦的老百姓在一起生活七年时间，跟困难群众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每次他下乡，见到困难群众或者贫困农民，他都很揪心、很动情，我们都有很明显的体会和感受。他一直在想各种办法帮助农民致富。比如，他当年很重视的农家乐，至今都发展得很好，周边很多大城市的人常到浙江的农家乐来消费，费用不高，吃住条件还都不错。还有很多城里的退休老人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搬到农村的农家乐住，他们的房租就足够支付在农村的生活费用了，农民也由此实现了增收。

丽水有一个畲族自治县，习书记要求省人大研究立法，保护畲族的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后来，省政府和省人大联合专门出台《浙江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为省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习书记非常关心老区人民。浙江的革命老区众多，他到浙江工作之后，第一时间就到丽水，参观了那里的革命根据地旧址，还到余姚的梁弄镇浙东抗日根据地看望老同志。他十分关心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不止一次地说，我们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一定要发扬老区的革命精神。在习书记的指导下，我们省政府每年都按计划给老区拨款，支持老区的建设和发展。省里还成立了浙江省老区工作领

导小组，专门做老区发展的相关工作，老区有任何新情况新问题，都能够及时反映上来，及时得到研究解决。

采访组：在各地任职期间，习近平同志对离退休老同志和机关干部都非常关心，请简要讲讲他在浙江是怎么做的。

章猛进：习书记对离退休老同志非常关心。他说过，这些老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们只会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多，我们一定要关心他们。习书记每年都会到老同志家里去看望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他们谈工作，谈浙江的发展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从他们那里汲取智慧和经验。

他对机关干部也非常关心。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但对机关干部则是在规定的限度之内能照顾就尽可能多地给予照顾。他当省委书记期间，生活和工作都严格遵守待遇标准。他住的房子不到 150 平方米，办公室也未达到待遇标准。但他非常关心机关干部的待遇，机关干部的住房，没达到待遇标准的，他都会尽量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

他还非常关心机关干部的医疗保障和健康状况。在他的关心下，省里专门在体育局办的体育设施中给机关干部设立了健身房、游泳池等健身设施，凭卡就可以使用。同时，他还要求机关干部多参加体育锻炼，多做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动，不要吃吃喝喝，更不允许到有伤风化的地方去。他还指示从省财政每年拿出 500 万元放在组织部，解决医疗费超支的机关干部的困难。习书记就是通过这样具体的举措，营造出了让机关干部安身、安心、安业的浓厚氛围。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注重信访工作，积极推动“下访”制度实施的情况。

章猛进：从 2004 年开始，全国各地群众上访呈现增加的态势，浙江也是这个情况。虽然浙江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相对富裕一些，但上访的人次也还是很多的，比如民办教师、转业军人，有各种问题需要解决，涉及人数多，问题也比较复杂。

针对群众上访，习书记提出了如下举措。

第一，把群众上访变为干部“下访”。他率先垂范，带领我们省里的领导同志，划片包干，现场办公，推动形成了“下访”长效机制。这样一来，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在基层化解掉了，群众上访就大大减少了。

第二，强化信访工作的力量。他说，一个干部要提拔，最好到信访局去工作

一段时间，锻炼锻炼，是很有好处的。他的这个思路很有道理。当时，信访工作所接触的事情包罗万象，干部要能面对地方上各种复杂的问题，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这样才能历练成熟。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深刻。当时，参加过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因为落实政策问题，1000多人聚集到了杭州。那天一早，我们到省政府门口一看，有500多人，再加上围观群众，人山人海，而且中老年人居多，我们很紧张。我马上向习书记做了汇报。他当时说的一番话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他们，要爱护他们，做好工作。要积极调查，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对他们进行安置。”他没有把这种大规模的上访看成是“洪水猛兽”，而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接待好他们以后，就组织力量赶快去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在常委会上进行汇报。大家在会上商定了一个补助金额。当时，我们还想在这个金额基础上再提高一点，但这可能会对全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最后，小局服从大局，我们按照政策规定发放了合理的补助。老兵们拿到了补助之后，上访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诉求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接下来就要到南京军区，甚至到北京去上访。幸亏在习书记的主持下，这次上访事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避免了事态扩大。

采访组：通过您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从不回避推诿困难，而是直面问题和矛盾，敢于负责担当。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会主动迎接挑战，解决问题。

章猛进：是这样的。习书记不是那种端坐在办公室、听完汇报就作指示的领导干部。他这个人既沉稳又果断，关键时刻很有担当，既能当指挥员，又能当战斗员。

比如，指挥“防台抗台”就是很好的例子。浙江位于东部沿海，几乎每年都有台风来袭。浙江的台风是很厉害的，特别是温州、台州那一片，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有一次大台风横扫过来，造成很大伤亡。习书记是从福建调到浙江工作的，福建也是台风灾害的多发地区，他在福建工作很多年，对“防台抗台”很有一套。每一次台风来袭时，他都亲自到防汛指挥部指导“防台抗台”工作。在我印象当中，前后就有10多次。他明确向我们提出要求：“少伤人，不死人。”虽然只有6个字，但这是非常高的要求，

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了第一位。在过去，浙江人曾这样说：“不死 100 多人的台风，都不算台风。”这话从侧面反映了台风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习书记还提出：“台风来到之前，要防；台风来的时候，要避；台风结束的时候，要抢（抢修水利设施）。”这是既实事求是又灵活机动的抗台理念，指明了对付台风的策略，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我记得，2004 年 8 月 12 日，台风“云娜”袭击浙江，在台州温岭登陆的时间是 12 日晚上 8 点。13 日一大早，习书记就到台州温岭去了。由于温岭是台风的登陆点，受灾非常严重，发了很大的洪水，水流湍急，有一个地方的 6000 多名群众被困。习书记表示，要到群众被困的地方去。我们劝他：“你不要去！你个子这么大，坐冲锋舟，万一出了问题，人家背你都背不动。”但他态度很坚决，还是坚持坐冲锋舟进到被困地区。他带我们进去以后，老百姓看见省委书记来了，都非常振奋，紧张的心情也得到了缓解。习书记和老百姓聊天，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不要紧张，还给他们分发矿泉水等救援物资。那天天气很热，我看到习书记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习书记在浙江工作的 5 年时间，为浙江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 5 年，他大量的时间都在基层，和老百姓在一起，和浙江人民并肩奋斗。那个时候，我就想，习书记未来必定能担负更大的重任。他从我们这里走出去，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光荣

（来源：学习时报，2021-03-03）

习近平在浙江（五）：“习近平同志既重视战略谋划 又强调狠抓落实”（上）

采访对象：张曦，1945年11月生，浙江宁波人。2000年12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03年2月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04年7月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05年12月，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11年3月退休。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5日初访，2020年6月16日补访。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张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时，您是省委秘书长，此后您又有两年多时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他到任之初，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张曦：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从福建省长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1月20日任省委书记。浙江当时正处在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世纪之交，全省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与此同时，浙江作为经济先发地区当时也正面临“成长的烦恼”，处于矛盾多发期，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浙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强；浙江经济整体质量仍然不高，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社会信用和市场秩序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人口、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协调；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城镇就业和农民增收压力加大，城乡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少。2002年是自1992年以来信访总量连续上升的第11个年头，2003年上半年全省三级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信访总量20余万件次。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习近平同志带着党中央的重托来浙江任职。中央对他有很大的期待，4700万浙江人民也强烈期盼在他的带领下不仅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能够攻克新难关，实现新跨越，发展得更好更快。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11日。受省委省政府和张德江书记的委托，我与省里有关同志到机场迎接他。见面后，习近平同志在车上与我们亲切交谈，并不时接听来自福建的电话。从言谈中，我感觉他与福建的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

第二天下午，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习近平同志同大家见面并讲了话。他自我介绍说：“我的籍贯是陕西，我出生在北京，是个北方人，但在福建工作了十七年零五个月，也算是一个南方人。接到中央的工作调动通知后，我一方面在感情上与福建人民难舍难分、依依惜别，另一方面又感到有一种迎接新考验的振奋。我坚决服从中央的分配，同时深感责任重大，我将在浙江的新岗位上努力工作，决不辜负党中央、省委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我的重托。”会上，他赞扬浙江是个好地方，表示在浙江工作可以使自己接受新的锻炼，学到新的东西，同时又表明了决心：“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就像上华山爬险道，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只能向上攀登不能停滞不前。”

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展，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我愿意在任何地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我从小熟背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不朽诗句，在福建工作时，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一直以此激励自己。三年前，我在任福建省省长的时候，还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古人名句来勉励自己，就是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要勤奋敬业地干工作，任何时候都要脚踏实地地做事情，任何时候都要将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现在我仍然这样要求自己，争取以实际行动向全省人民递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习近平同志这一番话，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谈到“要保持工作连续性，跑好‘接力赛’”，“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同时，要处理好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的关系，勇于开拓创新，创造更好的业绩，跑好‘接力赛’中的自己‘这一棒’。”这些话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俗话讲，“一个将军一个令，一届班子一个调”，讲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用“大手笔”全盘推翻前任定下的思路和举措，另起炉灶、另搞一套。习近平同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表态，不仅充分展示了他的“官德”，也给了全省干部群众一个“安民告示”，昭示他下一步治理浙江的强烈信号——既要“一任

接着一任干”，对过去浙江发展积累的经验优势加以继承发扬，又要与时俱进，开拓新思路，开创新局面，续写新篇章。

采访组：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首次系统提出“八八战略”。请谈谈“八八战略”酝酿出台的一些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2003年8月13日接受《人民论坛》杂志采访时说，“八八战略”是在调查研究和大家共同探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思广益的结果。其实，没有他的主导，就没有“八八战略”。我亲历了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的全过程，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从战略上系统思考和谋划浙江的发展，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带有根本性、前瞻性、长远性的问题，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浙江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在前列，是习近平同志当时面对的重大而首要的课题。

2003年2月10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要求大家抓紧调查研究，从七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认识：一是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二是关于建设经济强省、打造文化大省、推进依法治省；三是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四是关于“北接上海、东引台资”；五是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六是关于维护社会稳定；七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除了通过会议部署调研课题，习近平同志抓紧时间深入基层一线，用短短118天时间连续跑了11个市和25个县，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问计于干部群众。

二是深入统一思想、正式提出战略。调查研究的过程，既是形成认识、寻找办法的过程，也是统一上下认识、集中大家智慧的过程。在调研中，习近平同志关于浙江实现新发展的战略构想日渐清晰，在与省委以及省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和各市县负责同志交流中取得高度认同。他向全省正式提出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是在2003年7月10日。之前，6月底与7月初，习近平同志接连主持召开多场会议。如6月25日，向副省级老同志通报“八八战略”等有关情况；7月2日下午和4日下午，分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征求各方面对于开好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的意见建议；7月7日至9日，省委又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研讨

班，反复讨论完善报告。在他直接领导下，这一系列研讨和准备过程，对“八八战略”的凝练完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3年7月10日至11日，省委召开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习近平同志代表省委常委会作报告。报告第三部分全面阐释要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他在会议结束时还就落实“八八战略”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会后，省委对这次全会精神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对贯彻落实工作抓得紧而又紧。经过一段时间，“八八战略”的提法越来越深入人心，大概到2004年初就简称为“八八战略”了。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八八战略”首先是立足于浙江的优势而言的，包括过去积累下来的已有优势，如体制机制、区域特色产业、城乡协调、人文方面的优势；也包括深化认识而加以挖掘的潜在优势，如生态环境、山海资源、接轨上海等方面的优势；另外，还有怎样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同时，“八八战略”也是基于对新世纪的重要战略机遇和宏观背景、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对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从现实基础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迫切要求在整体发展战略上探求新的思路，实现新的突破。从历史机遇看，21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有苦练内功，提高素质，充分发挥优势，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才能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拓展更大空间，赢得更好发展。从战略目标看，浙江已经明确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注重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综合起来看，“八八战略”是浙江今后一个时期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部署。

三是深化实质内涵、狠抓战略实施。习近平同志于2003年7月10日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省委关于“八八战略”的决策和部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些决策和部署，有的已经全面展开，初见成效；有的已经作出规划，正在落实；有的还需制定政策，完善措施。贯彻这些决策和部署，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

“八八战略”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既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开放

性的战略框架。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十一届省委提出并大力推动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都是对“八八战略”的细化、深化和具体化。形势每发展一步，实践每推进一步，“八八战略”就向前深化一步。经过一任接着一任干，“八八战略”实施已有 15 年，浙江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了“八八战略”的科学性前瞻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坚持以调研开局开路，这个工作特点是特别鲜明的，您的感受更直接深刻。请您谈谈他刚到浙江时是怎样开展调研的？

张曦：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可以说，他在浙江的工作史，就是一部对浙江全省的“调查研究史”。通过调查研究，他了解民生民情，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悟出新方法、找到新思路、形成新举措、谋划新战略。他认为调查研究是一门“求真的学问”，是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破解各种难题。

2002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同志在干部见面会上说：“我初来乍到，对浙江的情况不熟悉，首先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熟悉工作，尽快进入‘角色’，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工作职责。”从 10 月 13 日到 18 日，他白天忙于各种会议，有几个晚上还有工作安排，难得的没有安排工作的晚上，他还开展了“特殊”的调查研究活动。俗话说，“若要好，问三老”。当时曾有同志讲，浙江的老领导们是“五世同堂”，指的是亲身经历过浙江革命、建设年代的历届老同志都住在杭州。这几个晚上，习近平同志连续看望了铁瑛、李丰平、薛驹等 7 位正省级离休老同志，听他们讲浙江省情，征求他们的建议。

为了主持起草下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同志不断听取省各个主要职能部门的汇报，出席原省领导早已安排好的各种会议，加上年末岁初必要的慰问活动，可以说是忙上加忙。尽管如此，习近平同志还强调听汇报不能代替亲自调研，再忙也要尽快跑遍全省。因此，到 2002 年底前短短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除绍兴、舟山两市，他已经调研了 9 个市，还去了海军东海舰队机关、省军区机关、东海航空兵部队、陆军第一集团军，以及省直机关、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中央和省级新闻单位等 10 多家单位。

习近平同志曾在与记者交谈时聊到，尽管这种调研还仅仅是初步的，还会有

“走马观花”之嫌，但是浙江的省情、民情要了解，全省的干部要尽快熟悉，一些事关浙江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需要省委省政府尽快决策，等不及啊！对于省委办公厅呈报的日程安排建议方案，他总是不断地做“加法”，插进很多去不掉、改不了的急事情，几乎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为了尽快多跑几个地方，他常常白天考察、开座谈会，晚饭匆匆扒几口就赶路换考察点。一到驻地，又立即找当地负责同志个别谈话，谈话结束后再审阅文件。调研结束回到杭州，整个省委大院，夜里最晚熄灯的一般都是习近平同志与省委办公厅工作的几个楼层。

习近平同志不仅亲自调研，还以点带面，努力推动全省领导干部开展调研。2003年2月10日，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意见，省委举行了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习近平同志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要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做好春季开局。会上通过了《2003年省委、省政府领导调研计划及有关重点工作》和《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两个文件，形成了2003年关于加快经济发展、加快社会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21个重点调研课题，明确由分管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牵头，并规定了落实的时间表。习近平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总负责人，还具体承担了经济建设专题的调研。第二天，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全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作讲话。在他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全省进一步掀起了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工作作风的热潮。

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我履行了这一条。”在浙江任职期间，他率先带头走遍浙江各个县市区，他还经常告诫领导班子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大家积极创造条件进行调查研究。一次他在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说：跟随领导调研，有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多去一两个人；我出差了、出国了、外出开会了，你们可以抓紧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搞些调查研究。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请您谈谈他对调研工作有哪些具体要求？

张曦：习近平同志认为，当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多方面转型阶段，开展好调查研究至关重要。围绕调查研究，他具体提出了四个要求。

一是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他常说，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各

方面的差异日益突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和重点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在浙江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全省依托地方民俗和文化传统，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块状经济特色。比如在宁波，有港口经济、服装产业；在金华，有东阳的建筑业、永康的小五金、浦江的书画水晶业；在温州，形成了皮鞋、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特色产业群。在这种种“不同”的影响下，党委和政府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大量增加，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同时，局部和个体所具有的代表性有所下降，曾被广泛运用的“蹲点一周半个月”、“解剖麻雀”等典型调查方法显出一定的局限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亲力亲为，也难免有其局限性，难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习近平同志引用《荀子》中的“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典故，提出要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特别是综合调研部门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他自己在调查研究时，既到基层调研，又到机关调研；既调研群众，又调研干部；既解剖典型、又了解全局；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又到困难群众较多、情况复杂和矛盾尖锐的地方进行调研。而且调研的重点往往放在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特别困难的地方。

二是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习近平同志要求每次调研都要有明确的主题。他曾说：调研选题就像搞科研，选题选好了就向成功走出了半，古时打仗之前都要到庙里烧个香，算一算，看看吉利不吉利，这是纯迷信的，但我们在调研之前也要算一算，评估一下题选得好不好，不能胡乱选。他指出，调查研究“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对多数调研成果而言，提高针对性也就意味着时效性，对热点问题、重要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快速反应、及时调查，积极为领导谋思路、出点子、想对策、拿建议、解难题，满足决策需要。只有“文当其时”，才能“一字千金”；只有“生逢其时”，才能“谋当其用”。2003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主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专题，至少开展过11次调研，调研内容包括“三农”工作、海洋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县域经济、重点工程等，还率团赴上海、江苏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学习。

三是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习近平同志早在2003年2月10日的省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就指出，在调研方法上要多样化，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关键要见实效，要解决一些突出问题、重点问题。他开展调查研究时，除了继承过去调查研究的好方法，还提倡结合新的学科理论、新的调研方法、新的调研工具等进行调研。他还要求党员干部在具体实践中，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大胆创新，多管齐下，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调研成果的质量。

四是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他强调“文可载道，以用为贵”，要求调研选题必须紧扣现实工作需要，出发点是为党和政府工作提供所需的对策建议，落脚点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视野上必须宽广开阔，既要预见潮流和大势所趋，又能看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调研中，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心分析和研究，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特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途径。在调研基础上形成建议时，必须兼顾需要和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省委政策研究室是省委的参谋和助手，习近平同志明确表示对政策研究部门的要求要“更高一点”，不仅要求他们重视调查，更要求他们重视研究，认为调查后善于研究是政策研究部门工作的关键。他强调“抓点时要善于管窥全豹，跑面上要能够见微知著，综合提炼”。强调既要有“抓住重点、找准典型”的敏感性，又要具有“锲而不舍、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他还要求政策研究部门写调研报告一定要有“精品意识”，能够帮助人们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能够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能够为领导决策提供真实的依据，能够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 2004 年 1 月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特意撰写四副春联，横批都是“求真务实”。请您结合这件事，谈谈他在实际工作中是怎样抓落实的。

张曦：“八八战略”提出后，省委紧锣密鼓出台一系列重大决策。2003年年底，省委召开第十一届五次全会，强调 2004 年是全省围绕“八八战略”这条主线扎实推进浙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狠抓落实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把抓落实摆上重要位置，做到落实、落实、再落实。实践表明，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而不实，等于白抓。抓好落实，我们的事业就能充满生机；不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2004 年 1 月 29 日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新年的第一次专题学习。休息了几天，大家又碰到一起，

气氛轻松活跃。习近平同志一进会议室，就与大家握手拜晚年，紧接着就进入会议主题：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部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全面抓好当年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习近平同志微笑着给大家讲：“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逢年过节都要写春联。正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期间，我情之所至，忽发奇想，写了四副春联，权且作为我的一点学习心得，与同志们共勉互励。”

习近平同志撰写的四副春联，横批都是“求真务实”。他介绍说，第一副春联的上联是“求客观实际之真”，下联是“务执政为民之实”。这讲的是求真务实的深刻内涵，就是求什么真、务什么实的问题。他强调，要把深化思想认识作为首要前提，把正确认识国情和省情作为基本依据，把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和运用规律作为根本要求，把切实抓好工作落实作为基本要求，把制度建设和创新作为体制保证，把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副春联的上联是“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下联是“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这讲的是求真务实的主要途径，就是怎么求真、怎么务实的问题。他说：求真务实是一种科学精神，一种扎实作风，一种党性要求，其真谛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主要途径就是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努力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深化理论武装不仅是学习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而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和统一，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的。

第三副春联的上联是“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下联是“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这讲的是求真务实的基本要求，就是如何做到求真、做到务实问题。他说，能否做到狠抓落实，是否善于狠抓落实，这是衡量领导干部作风、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浙江而言，就是要紧紧围绕“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来进行。在抓落实过程中，要认真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在大局下行动的自觉性；二是眼前与长远的关系，既抓紧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着眼未来发展，建立长效机制，追求长期效果，坚决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三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和发扬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做法、好经验，同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推动各项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第四副春联的上联是“高度关注民生系真情”，下联是“坚持为民谋利出实招”。这讲的是求真务实的根本目的，就是求真为了谁、务实为了谁的问题。他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说到底是为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求真”要立足于为民“求真”，“务实”要立足于为民“务实”。关注民生，为民谋利，关键在于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真心诚意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听了习近平同志这一番话，同志们都很受启发。大家感到，这四副对联其实是习近平同志利用春节休息时间，在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全面深入思考全省各项工作后进行的思想提升，以对联的形式表述出来，深入浅出、印象深刻，使大家迅速得到方法论启示，效果很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推动实施领导干部下访。当时您具体分管信访工作，请谈谈当时作出下访决定的背景和你们到浦江第一次下访的情况。

张曦：当时，全国各省信访普遍呈现上升势头，信访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在浙江，群众信访总量居高不下，集体上访已成为群众信访的主要形式，越级信访、异常信访、突发性信访事件突出，择机上访日渐增多，信访活动出现明显的组织化倾向。上访内容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特殊群体要求提高政治生活待遇、村级换届、环境保护、涉法涉诉等热点问题，还有反映基层干部违法违纪、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产生这些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正处于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建设力度加大，各类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日益增多。而浙江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先发、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改革力度大、进展快，各类矛盾和问题自然也暴露得早、暴露得多，有的甚至还很尖锐。

2002年10月，面对全省严峻复杂的信访形势，习近平同志多次召集我们分析研究，决定在全省实施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为民谋利的基础性工作，在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层是产生信访问题的源头，信访工作要到位，必须重心下移，深入基层；领导下访是新时期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信访工作的一种探索和新思路，也是从源头做好信访工作的一项有力措

施。他提到，早在 1988 年，他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建立了地、县、乡镇三级领导下访制度，把领导“下访日”作为领导“服务日”、“公仆日”，解决了大量问题，深受群众拥护和欢迎，《人民日报》曾作了专题报道，在全国引起积极反响。后来，他调到福州工作，又把这项制度带到了福州。在习近平同志直接指导下，从 2003 年 6 月开始，我们选择诸暨市、浦江县和衢州市开展领导下访接待群众试点工作。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搞信访试点有一定基础；浦江县虽是浙江省中部的一个小县，却是信访大县，2002 年全县受理信访 10307 件（人）次，县信访局接访登记的案件真可谓“堆积如山”，群众越级上访，去金华、到杭州、上北京，是全省信访管理重点县；而衢州的信访情况则处于前两者之间。选择这样三个县、市开展试点，具有一定的对比参照意义。

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下访就选择了情况最复杂、矛盾最尖锐的浦江县。他非常重视下访前工作方案的制定，不仅认真阅看市县上报的材料，还亲自指导访前问题的摸底梳理，接访时间、场地的选择，省、市、县三级下访部门负责人的组成，接访流程、接访力量的安排，接访秩序维护、应急预案制定等重要环节工作。他几次强调，下访前要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各种手段大范围反复发布下访公告，让全县上下都知道，并邀请新华社等各级媒体实施舆论监督。他还要求下访必须注重实效，强调访后的集中调处工作，按照“谁下访、谁接待、谁负责处理”的原则实行包案办理，上一级要建立督查制度，切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

2003 年 9 月 15 日，省、市、县三级信访局联合署名在浦江县报、县电视台、县广播站等连续 3 天发布公告。公告一出，全县立即轰动，老百姓奔走相告。人们说，没有见过哪一朝哪一代的“官”，敲锣打鼓地叫老百姓来“告状”的。他们纷纷报名，整理上访材料，有的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积案都翻了出来。短短 3 天时间，全县共有 429 批次、数千名群众登记报名。

9 月 18 日上午 8 点，习近平同志带着省、市、县三级有关部门 100 多名负责人来到浦江县浦江中学，分别进入 14 个接待室。习近平同志与我及有关同志在第一接待室。第一个走进来的信访群众是县政协委员蒋星剑，反映 210 省道浦江段拓宽改造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征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当场拍板：这是一条山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好。蒋星剑激动地站起来，双手紧握习近平同志的手。12 月 18 日，210 省道扩建工程在村民的欢呼声

中如期开工。2005 年 10 月，全长 19.8 公里的 210 省道浦江马岭至浦阳段二级公路全线贯通。当地广大村民自发联名，给习近平同志寄去一封盖有 5 个乡镇、97 个村民委员会鲜红印章、代表 20 多万村民群众的感谢信。

从第二批接待开始，群众反映问题的“火药味”浓了起来。有 5 名上访群众反映城市拆迁安置问题，听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解释，群众就气呼呼地与他们争执了起来。习近平同志耐心听完双方意见，和颜悦色地给他们做工作。听了习近平同志通情达理的一番话，5 名群众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鼓掌，其中一位群众说道：“我们对书记的答复很满意，我们农民也是有觉悟的，只要政府多听听我们的呼声，做到政策公开，安置公平公正，我们会支持旧城改造的。”

忙碌了一上午，接待活动临近结束，远在 50 多里外的蒿溪村 100 多名群众赶来上访，可事先没有登记，按规定不予接待。习近平同志知道后说：“人家跑那么远的路，不容易，还是把他们请进来，接待好。”后来像这样临时报名的又来了 100 多批，全部得到接待。一天时间下来，习近平同志和省、市、县三级 100 多名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 436 批 667 人次，当场解决 91 个问题，定性清楚劝其息访的 21 件，交办落实责任的 324 件。接待日活动结束后，省直机关厅局和市县的负责人都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讲老实话，开始我们都有点担心，怕有群众要求得不到满足，不讲理，会出乱子。一天下来，有这么好的结果，真是没想到。”

采访组：浦江下访之后，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领导下访在全省推开的？取得了哪些成效？

张曦：习近平同志说过，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从浦江回来后，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在全省全面推开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工作。之后，他每年坚持带领我们下访。200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同志率领有关同志到临安市下访，当天共接待群众来访 267 批 492 人次，当场解决 34 批 88 人次反映的问题，交办了 172 批 290 人次反映的问题，作出定性劝其息访 61 批 114 人次。2005 年 8 月 15 日，他带领有关同志到德清下访，当天接待群众来访 185 批 296 人次，当场解决 40 批，交办限期调处 101 件，解释政策、宣传教育后自动息诉 44 件。2006 年 8 月 15 日，他带领有关同志到衢州下访，当天接访点接待群众来访 167 批 315 人次，其中当场解决 76 个问题，息诉与交办 91 件。

习近平同志还先后在“之江新语”专栏上发表多篇关于下访工作的文章，通过短小精悍的评论，向全省传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有力地统一各级干部思想，指导下访工作的开展。

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省、市、县各级领导进一步把信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信访，带头搞下访，一级带着一级层层抓落实。2003年12月23日，在全省信访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和吕祖善省长与11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首次签订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此后，不单目标管理责任书一年一签，每年还召开全省信访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把信访工作纳入创建“平安市县”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赋予信访部门对受理的信访件有交办、督查、协调和建议追究责任等职能。深化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修订了《浙江省信访条例》。每年都制定年度县（市、区）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分办法。直到习近平同志赴上海工作前两个月的2007年1月28日，他还与各市签订了当年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在习近平同志连续5年直接推动下，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取得明显成效。2003年至2006年8月，省领导先后86人次下访到42个县（市、区），会同市、县领导一起接待处理群众信访近1万件（人）次，办结率96%以上。省领导每年下访，带动了市、县两级党政领导经常性下访。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市、县党政领导共接待群众3.1万余批次9.5万余人次信访。2005年，全省信访总量自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浙江群众进京上访量明显下降，集体上访量也明显下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聚集省政府大门口的上访由2003年的227批下降到2005年的38批。浙江群众非正常上访量从最多时的全国排名第3位后移到2005年的第30位，是全国各省区市非正常上访量最少的地区之一。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连续数年在《浙江日报》发表“之江新语”系列短评，引起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请谈谈他做这件事的最初设想以及具体实施的有关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2003年1月14日，在全省宣传工作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表彰会上，他提出宣传思想战线要打好主动仗。要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组织新闻媒体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在重要版面、黄金时段开辟专栏专题专访，多层次、多角度地推出一批有深度的社论、评论、言论和理论文章，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平时，习近平同志也要求省委办公厅通过《浙办

通报》《今日浙江》等渠道发布工作信息，公告省委省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多次指示我们，组织宣传是办公厅服务省委工作大局的一个重要职能，省委办公厅要把省委的声音及时传送给新闻单位，使各类媒体共同唱响省委的主旋律，推动省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当时，中央和省内新闻媒体都想采访习近平同志。因此，凡经他同意的，我们都尽量安排时间。特别对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的时政记者周咏南同志给予更多“特权”，许多重要会议和考察活动都安排他参加，很多时候还安排到“一号车”。

习近平同志工作作风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凡是叫大家做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在《浙江日报》开设“之江新语”专栏就是他这一作风的充分体现。他坚持在4年多时间里为这一专栏撰写稿件，充分体现出他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在以正确言论引导社会舆情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工作风格。

采访组：当时“之江新语”专栏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内容上有哪些鲜明特点？

张曦：“之江新语”专栏相对固定设在《浙江日报》头版左下角的位置，篇幅不大，但设计十分醒目，很有特色。栏目刚设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些短评是习近平同志撰写的。后来，越来越多干部发现这些短评与习近平同志近日报告或讲话中的重要内容非常一致，这才明白“之江新语”中的评论都是由习近平同志主笔，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干部和读者关注这个栏目。通过这些短小精悍的评论，他们及时了解了省委书记的所思所想，从而更进一步深入领会省委的重要部署，更有力地推动全省工作的开展。后来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取名《之江新语》。

《之江新语》选编的每篇文章，可以说都是习近平同志有感而发、因时而作，具有极强的时效性、针对性与思想性。就像当年毛主席的瑰丽诗作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一样，习近平同志的这些短文都是他深入田间、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等调研的成果，都是他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部署、创造性地推进全省工作的思想结晶。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些文章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闪耀着习近平同志从事领导工作的思想光辉。

《之江新语》的文章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充分体现了他“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每篇基本控制在300—500字，可读性强；观点清晰敏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形式生动形象，善用比喻与案例，讲道理深入浅出；文风朴实动人，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谋利的意识，老百姓看得懂而且喜欢看。俗话说“文如

其人”，现在重读这一篇篇评论，就像当年习近平同志面对面地与你讨论、谈心一样。《之江新语》的内容涉及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方方面面，“八八战略”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循着文章发表的时间线索，不同时期又都有着鲜明的特点，但总是围绕着省委中心工作及时发声。2002年10月，他一到浙江就进行密集调研。2003年2月10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调查研究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作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讲话。他在《之江新语》的开篇之作《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就来源于此。之后，他还写了《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等文章。2004年1月29日，他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就“求真务实”狠抓落实问题作专题发言；2004年2月2日，在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上又提出要“大力推进机关效能建设，确保完成‘狠抓落实年’的各项目标任务”。随后，他于2月3日、8日、23日、26日、27日及3月3日、8日、18日连续在“之江新语”专栏写下《求真务实要出实招》等八篇文章。2004年5月10日至11日，省委第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紧接着5月17日、5月19日，他连续发表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样是政绩》《要“平安”，不要“平庸”》。2005年7月28日，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他作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提供强大力量》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他于8月12日、8月16日发表了《文化是灵魂》、《文化育和谐》。在2006年10月30日，他又发表了《“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3月25日，“之江新语”专栏同时刊登了习近平同志的2篇短论：《“书呆子”现象要不得》和《追求“慎独”的高境界》。同日出现在《浙江日报》头版的，还有题为《中共中央决定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新华社电讯稿，十分醒目。大家不难推断，习近平同志在调离浙江前夕仍然十分关心“之江新语”栏目。他对全省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真是令人感动！

《之江新语》是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思考。连贯起来学习，《之江新语》又显现出高度的思想性、系统性与科学性，可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天地之大文章”，忠实记录了习近平同志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

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我们知道，浙江美术馆就是在他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关心指导建设浙江美术馆，是习近平同志推动浙江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也是他领导作风的生动体现。

众所周知，浙江是个美术大省，宋元明清大家辈出，新中国成立前后又涌现出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八五”“九五”期间，曾不断有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设浙江省美术馆的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已将这项工程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有建起来，这件事就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2002年2月1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中国美术学院，建议浙江建一个一流美术馆。4月29日，省委召开浙江美术馆建设专题会议，议定美术馆馆址选在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长桥公园对面、玉皇山麓地带，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省财政拨出专款，由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副秘书长牵头，成立美术馆建设协调小组。

筹建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开展后，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产生。由于美术馆拟选地址位于规划严控的西湖风景名胜区，规划内又有省军区通讯连与杭州市的一个停车场，涉及部门众多，动迁工作难度很大，需要省、市和军区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协调，还得积极争取有关专家学者给予有力的论证依据。基建组的同志们为此十分发愁。

记得2002年11月下旬，习近平同志刚任省委书记不久，我趁空隙向他简要报告了筹建美术馆遇到的困难。这件事立即引起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他明确表示新官要理旧事，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并且要切实加快工作进度。基建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精神为之大振。

2003年1月31日是农历除夕，一大早8点半，习近平同志带领省市主要领导及有关负责人冒雨对美术馆拟议选址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一结束，习近平同志立即在就近的柳莺宾馆主持召开会议。他明确指出：“浙江文化底蕴深厚，美术大师和人才辈出，中国美术学院又坐落于杭州市，浙江美术在全国有着重要地位。美术馆建设意义重大，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都很重视。这是一个既定的决策，我们要继续做下去，抓紧工作，尽快实施启动，抓好落实。”

之前，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习近平同志明确表示应该建在西湖边上。他还指出，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

2004年初，美术馆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就绪。这时已接近春节放假，省委工作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但习近平同志还是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关心研究美术馆建设。1月5日，从早上8点半开始，整整一天是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傍晚，会议一结束，习近平同志立即领着所有常委走进隔壁的小会客厅，仔细审看美术馆的三种建筑设计方案图与模型。他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终于“拍板”，确定了由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程泰宁建筑设计事务所程泰宁教授主持设计的充分体现中式建筑风格的方案。

2005年5月15日，浙江美术馆奠基开工典礼隆重举行，习近平同志宣布奠基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7年底，浙江美术馆顺利竣工，2009年8月正式开馆运行。浙江美术馆从“八五”期间动议至“十一五”期间最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落成，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十分重视和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我到浙江大学工作后主持的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宋画全集》是该工程第一期项目。项目的每一个关键点、每一段攻坚期，都离不开习近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2005年，为响应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号召，我们经过反复商量论证，于6月8日正式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关于汇编出版两岸故宫宋画藏品的建议。因为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宋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瑰宝，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亟须汇集整理。以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先进印制工艺，完整地、高质量地出版宋代绘画集，是国内外艺术界、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迫切要求。浙江杭州是南宋故都，见证了当时的文化繁盛，有责任整理出版宋画。习近平同志接到报告后批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同时，他还让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陈敏尔同志与我们研究一下，提出一个推进实现的方案。

在习近平同志直接关心下，第一笔启动资金很快下拨。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浙江大学工作，他不时会关心地问起《宋画全集》项目。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去上海履新前夕亲切接见我，还勉励我们要确保质量完成好这个项目。

2008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会议座谈会。我代表浙江大学参加会议，随身带去了赶制出来的《宋画全集》样书稿，会前送给了他。7月17日，我书面向他详细汇报了《宋画全集》的实施情况，同时呈上序言稿请他审定。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审定了序言并批示：

“《宋画全集》编纂工作开展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望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好这一光荣历史任务。”12月11日，我去中南海参加由习近平同志主持的高校党建工作座谈会。会后，他问我起我的近况，我又向他报告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2008年12月28日，《宋画全集》正式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座谈会。2010年9月，《宋画全集》按计划基本出齐。9月13日，我写信向习近平同志汇报，建议在《宋画全集》完成后，拓展实施包括《先秦汉唐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在内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9月21日，习近平同志批示：“获悉《宋画全集》出版任务进展顺利，感到很高兴。下一步出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打算很好，可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各方支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收到了这个批示后，项目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十分清楚，做好这项工作，意义十分深远，而难度更大。中国绘画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更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系统搜集、梳理并高精度地出版这样浩瀚的大型图像文献。大家决心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同志的郑重嘱托。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同志飞抵浙江舟山考察，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第一次到浙江考察调研。26日晚上，他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仔细翻阅“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样书，详细听取了有关工作的汇报。第二天下午，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他再次肯定了这个项目的意义。

根据5月26日晚我向习近平同志请示情况，8月10日，我就“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工作向他进一步作了书面汇报。8月20日，他给中宣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四位主要领导作出了重要批示。习近平同志日理万机，如此关心“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作，真是令我们终生难忘！

12年来，这个项目凝聚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量心血，充分展示了他对浙江文化建设的全情支持，对大规模系统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更体现出他一以贯之尊重文化传统、注重文化传承的人文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无论在哪一级领导岗位上，都高度重视并坚持读书学习。请您谈谈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是怎样坚持学习的？

张曦：作为省委主要领导，习近平同志日常工作的繁忙程度不言而喻，但他还是千方百计抓紧学习各个方面知识。这里我想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与三位学者学习交流的故事。

习近平同志对宗教问题一直非常重视。早在1998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民宗厅视察检查工作时就强调：“福建宗教问题这么集中，宗教部门要研究，要摸索出规律，探索管理办法。”浙江与福建毗邻，同样有着悠久的宗教历史和门类众多的宗教流派。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后，深知这项工作的艰巨。2004年初，他决定适当时候召开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为此，他在大力推进“八八战略”工作的同时，不断了解全省宗教工作情况，几次要省委办公厅与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相关材料。他说，做好宗教工作，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各级领导干部要懂宗教、抓宗教，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宗教工作动态，认真指导和协调做好宗教工作。仅在杭州市，他就专门腾出整块时间带着我们专程走访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与灵隐寺、抱朴道院的佛教、道教界人士交流，到省民宗委听取工作汇报。

习近平同志十分清楚，宗教与哲学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为了从认识论层面深入了解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2004年春节后，习近平同志叫我们联系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大学，约请两位学者深入讲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时间各为两个小时左右。我们先后邀请了浙江大学西方哲学史学者陈村富老师和省社科院中国哲学史学者吴光同志。这两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来请示事先是否要审稿，我们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答复：“不审稿，放开讲。”讲解时间安排在4月15日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之前。吴光同志因时间有冲突，当时没有安排上，陈村富老师约定在4月7日。

那天下午3点，习近平同志在省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听取了陈老师的介绍，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同志和我陪同。习近平同志一进门就与陈老师热情握手，并示意他请坐，然后打开笔记本听他开讲。陈老师讲课经验丰富，他的“开

场白”是：“我没写讲稿，没带一个字的书面材料。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随时调整，也可以是讨论式的，您提问，我尽自己所能回答。”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就按他事先考虑的方案讲。陈老师从做好行政领导工作的角度介绍了西方哲学及其文化背景、所应把握的基本线索、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当今学者们所持的基本观点。在讲述希腊哲学和希腊文化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纠正了“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念，并重点介绍了《野蛮的欧洲：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后 800 年》这本书。说到这一段时，习近平同志插话与陈老师交流荷马史诗中说的特洛伊城。当讲到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时，陈老师提到现在高校政治理论课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师受教学大纲束缚，围着基本概念、原理和运用题转；另一个是不少教师缺乏哲学史的观念，缺乏文化史和新兴学科的知识。这时张浚生同志插话道：“现在学校的政治课确实是个问题，学生不爱听。”习近平同志点头表示：“这个问题要研究。”陈老师是福建龙岩人，他的福建“普通话”让同是福建籍的张浚生同志听起来也有些吃力，但习近平同志笑着表示听得懂。他给我们解释，过去他已经看过不少西方哲学史著作，对这些专业术语都很熟悉，加上他在福建工作生活 17 年多，接触过各地方言。在轻松愉快的交流中，原定两个小时的课程陈老师不知不觉讲了近两个半小时。事后，陈老师告诉我：“大凡开设过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老师，凭借多年形成的职业本能，就能对听讲人的专注度、理解力、学问功底和特点，做出一定的判断。习书记这位‘特殊学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笔记比我们在校的研究生都勤快、认真。从他的落笔和表情，可以推测他不仅记要点，而且关注我提供的破除旧观念的新信息。”

虽然全省宗教工作会议前没能安排上听吴光同志的介绍，但习近平同志一直记挂着这件事，让省委办公厅联系，最后把讲课时间确定在 6 月 6 日。那天下午 3 点，吴光同志来到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重点介绍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哲学的定位、特色与时代性问题；二是“浙学”的内涵、当代定位及其现代价值。同时，吴光同志对浙江建设“文化大省”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同志听得非常认真，边听边做笔记，偶尔插话交流，如老子讲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的多层含义，“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区别等等，还询问了省社科院办公用房等问题。

这让我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对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了如指掌。每到基层调研，

总会不时与大家聊当地的人文掌故，一次他提起唐代义乌籍诗人骆宾王，还诙谐地给我们讲：“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平时，他对南宋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嘉学派的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浙东学派”以及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等思想和著作也十分重视。他曾说，王阳明以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专制的剖析批判，是有清一代浙江学人理性自觉、思想解放、富有创新的最重要代表；而从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到马一浮的“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箴言，则可以看作浙江学人反对空话、务实创新的一贯思想作风和学术宣言。2006年4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余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专门向会议组委会发去亲笔签名的贺信。

2006年初，我全职在浙江大学工作。三四月间，省委办公厅来联系，要求推荐一位老师给习近平同志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我们上报备选名单后确定为郁建兴老师。因习近平同志临时有重要安排而两次改期，最终定于7月13日下午两点，在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听讲。郁老师讲完回来后，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他向习近平同志介绍了四部分内容：辩证法的起源、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他先讲了辩证法的语言学起源和它的存在论起源，花了较大篇幅讲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然后又介绍了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哲学家卢卡奇，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中坚人物哈贝马斯，还有美国当代思想家詹姆逊等对于辩证法的理解。郁老师讲了两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又与他讨论了大约40分钟，并了解了当前国内介绍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时隔多年，参与过这三次小型学习交流会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好学，对相关知识有长期的积累；学习交流前，都是“有备而来”，不仅听得格外认真，边听边记，而且还不时结合浙江实际和自己的思考，提出各类问题与他们探讨。种种情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来源：学习时报，2021-03-05）

习近平在浙江（五）：“习近平同志既重视战略谋划 又强调狠抓落实”（下）

采访对象：张曦，1945年11月生，浙江宁波人。2000年12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03年2月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04年7月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05年12月，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11年3月退休。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5日初访，2020年6月16日补访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作为省委书记，有哪些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曦：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初到浙江任职，2003年7月就提出“八八战略”，“八八战略”从酝酿到出台仅仅9个月时间。9个月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已经永远铭刻在浙江的历史上，铭刻在浙江人民的心中。习近平同志讲过：“一个高明的领导，讲究领导艺术，知关节，得要领，把握规律，掌握节奏，举重若轻。”“八八战略”决策迅速形成并成功实践，正是习近平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发挥“一把手”作用。在他看来，“一把手”既是领导班子中平等的一员，又在领导班子中处于关键位置，负有重大责任。“一把手”是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是一个地方和部门贯彻中央大政方针、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第一责任人，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是“一把手”的根本职责。他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站在战略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要进一步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善于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面对快速发展变化的环境，习近平同志经常对我们讲，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要把浙江放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中去考虑谋划，要抢抓机遇期，不能错失良机。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领导干部人格魅力的示范带动作用。他在一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讲话指出，人格魅力是领导干部人品、气质、能力的综

合反映，也是党的干部所应具备的公正无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等优良品质的外在表现。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但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力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身模范作用好，人格魅力强。他要求省级领导干部注重身体力行，以自身人格魅力给人们以思想上的正确引导和行为上的良好示范，在领导工作中靠前指挥，在钱物使用上严守规定，在用权用人上坚持原则，在处理问题上公道公正，在解难帮困上尽心尽力，在工作作风上求真务实，在生活待遇上不搞特殊化，在团结共事上胸怀坦荡，努力树立自身过硬、组织信赖、下级钦佩、群众拥护的良好形象。

习近平同志严格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他经常对我们强调：事业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是 4700 万浙江人民的事业，领导是集体领导，工作思路是集体的贡献。凡属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问题，包括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情等，都必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去办。但由于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个人阅历和知识结构不一，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水平也不尽相同，在讨论问题、作出决策时自然会见仁见智，发出“多种声音”，而这正是坚持集体领导、形成科学决策的基础。他还带头表态，作为省委书记，愿与大家共勉，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好“一把手”的班长作用方面带好头，起好表率作用。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班子团结，认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发挥出整体合力。2002 年 11 月 23 日，他在任省委书记后第一次主持的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就对我们提出要求：“要自觉增强党性修养和团结意识，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自觉维护班子的团结。”2003 年 7 月 10 日，他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道：“团结是班子建设的重要问题。讲团结是讲政治、顾大局的表现。”“加强团结，‘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应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善于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善于团结各方面同志包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善于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防止和克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和各行其是。”200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同志在新任市县党政“一把手”民主集中制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

产力。”“作为各级党政‘一把手’，都要补台而不拆台，你落下的我主动捡起来，你不足的我主动补上去，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演一台‘二人转’的好戏。”要“用真诚赢得大家的理解和信任，在合作中加深了解，在共事中增进团结，以坚强的党性、良好的作风、规范的制度和人格的魅力抓好班子自身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总是亲临一线，指挥在前，特别是对公共突发事件应对有序，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靠前指挥。他说：“领导干部在急难险重等关键时刻，应该冲在最前列。”刚到浙江工作那几年，浙江自然灾害频发，各种突发事件纷至沓来，他带领浙江干部群众抗击非典疫情、防台抗台以及抗大旱，那种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的神态语调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如 2003 年 4 月 19 日，杭州临床确诊 3 例输入性非典病例，这是我省首次发现非典病例。习近平同志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及时对抗击非典作出决策部署，并带着我们先后视察了省武警医院、省疾控中心等单位。视察期间，他与每一位传染病实验室人员握手，向他们表达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在划定隔离点的次日，他亲临察看，逐一慰问医务工作者和被隔离居民。在那样的特殊时刻，习近平同志亲临一线，对浙江人民抗击非典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2004 年 8 月，台风“云娜”登陆浙江，这是在浙江登陆的最强台风之一。8 月 11 日，习近平同志正带着我们在金华考察调研，一接到“云娜”可能在浙江登陆的报警，他当日下午立即赶回杭州。从 8 月 11 日晚上到 8 月 13 日，他 4 次前往省防汛防旱指挥部，亲自指挥部署防台工作。他说：“海上渔民有 8.2 万人，要通过各种手段联系到他们；近海滩涂养殖人员 12.5 万人，这批人很多是民工，哪里知道台风有多大威力，必须转移。”围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不死人，少伤人”目标要求，浙江牢固确立了“生命至上”的防台宗旨，至今为沿海各省（区、市）广为效法。

习近平同志做事总是有一股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气神。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 12 个小时以上。除了日常工作，还经常会有突发情况需要处理。尽管如此，习近平同志对于定下的计划一定会千方百计完成。2004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的文章中写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良好的精神状态，能极大地激发人的智慧和潜能，产生巨大的力量，从而克难制胜，成就事业。”他认为，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领导干部在工作顺利的时候，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并不难，难的是在面对众多矛盾和问题时、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他时常鼓励我们，面对矛盾和困难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要有大无畏的气概，要有克难攻坚的勇气。

习近平同志十分注重工作方法。他每日在繁忙的工作中做到游刃有余，就是因为他深得要领，把握规律。2005年4月27日，在参加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时，他讲道：“我经常说，这么多文件，全部看是‘官僚主义’，因为这样就被文件套牢了；全部不看也是‘官僚主义’，因为这样会漏下许多重要的信息。正确的方法应当是精读和泛读相结合，这方面省委办公厅也要帮助把把关。省委办公厅还应从提高工作效率、厉行节约的角度，减少和控制文件数量。关于‘会海’问题，大家反映也比较多。今后要采取措施，建立健全会议审批制度，从严控制，尽量减少，并提倡开短会、说短话，切实提高会议的质量和效率。”

习近平同志严以律己、率先垂范，不仅体现在模范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严守党的纪律等大的方面，他在小事小节上也严格要求自己。2004年3月20日，他发表文章指出：“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也见品德。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小事当慎，小节当拘，确是对领导干部的金玉良言。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己，懂得是非明于学习、境界升于自省、名节源于修养、腐败止于正气的道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崇尚节约，反对一切形式的铺张浪费。现在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在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就已有类似的要求。2004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丽水调研时指出：“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两个务必’和‘为民、务实、清廉’教育，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和纪律，做到严以律己、廉洁自律，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行为，坚决制止名目繁多、没有实效的各类节日庆典活动，严格控制茶话会、联欢会等活动数量和规模，不组织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拜年互访活动，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力戒浮躁之气，奢靡之风。”2006年1月24日，他在省委办公厅系统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珍惜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张纸、每一粒粮，尽自己所能节约每一点资源；要自觉抵制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不奢华、不浪费、不攀比，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意识深入人心。”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总是亲临一线、指挥

在前，特别提到他 2003 年指导浙江抗击非典的情况。17 年后，他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鉴往知来，看到我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越发让人想知道他当年是如何具体指导浙江抗击非典斗争的。请您展开讲一讲。

张曦：17 年前我们遇到的非典，是人类在 21 世纪发现的第一个烈性传染病。2002 年 11 月，广东佛山发现国内首例非典病例，随后，疫情蔓延到中国大多数省份。2003 年 4 月下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华北 5 省区市疫情严重，蔓延趋势不可预测。当时浙江虽然还未发现疫情，但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贸易大省，对外交往广泛，人口流动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每天进入浙江的流动人口有 8 万人左右，特别来自疫情较严重地区的就有近 8000 人，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浙江存在发生输入性疫情的极大威胁，疫情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习近平同志很早就洞悉了非典疫情对浙江经济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亲自指挥、精心部署，带领省级各套班子的同志，统筹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他多次召集会议，听取专题汇报，对大家说：做好非典的预防、治疗和控制工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正确认识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动员全省人民齐心协力，坚决打好非典防治工作这场硬仗。要切实把非典防治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要研究制定有效的应对预案和防治措施，加强对非典疫情的监控、检测，加强对重点人群、重点单位、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的卫生检验和疫情预防工作。在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下，全省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好了“迟早要打一仗”的充分准备。

全省各地科学、规范、有序开展防治工作，省里制定下发《关于加强春季传染病防治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及一系列工作文件，举办各类业务技术培训班，开通 24 小时春季传染病咨询热线电话，积极开展科普宣传教育。4 月 7 日起，全省实行每两日疫情及防治工作报告制度；4 月 14 日开始，实行每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机场、车站、码头等设立密切接触者留验站。积极储备各类必需物资和药品、器材设备。为严防国内个别地区曾发生过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省卫

生医疗部门还购置了十几套高防护等级的防化服。

事实证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亲自部署的全面严防严控措施十分必要、非常及时。自3月份以来，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舟山等地先后共报告21个可疑病例，虽均被一一排除，但各地在反复演练、实战中不断堵漏洞、补短板，得到锻炼，为及时发现疫情并有效遏制其蔓延赢得了主动权。

采访组：针对浙江当时出现的非典确诊病例，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哪些指示和要求？浙江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

张曦：2003年4月19日，杭州出现首例非典临床确诊病人。22时30分许，专家们向习近平同志等省领导汇报病情，习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专家建议后当机立断，作出事关全省抗击非典战役全局的5点重要指示：抓紧确认病人病症；全力救治病人；果断采取严格的隔离、留验、消毒等措施；全面启动应急预案；疫情确认后，迅速上报并及时对外公布。

20日凌晨0时20分，浙江省向国家卫生部汇报有关情况；凌晨1时许，杭州市非典防治应急预案启动；凌晨3时许，浙江省第一号《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公告》审签；一辆特殊装备的救护车载着3位非典病人转入市六医院；5时前，杭州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对确诊病人近期接触过的2个单位、5个生活小区、425个居户、1342位市民全部实施隔离；6时，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播发省第一号公告；10时，杭州电视台各频道以5分钟一次的高频率紧急插播滚动字幕消息。

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精神，为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杭州市率先在全国采取多个非常之举：如第一个对所有与非典病人有密切接触者全部实行隔离；第一个果断对320多家影剧院、歌舞厅、卡拉OK厅及人防坑道等场所实行临时停业；第一个控制全市药品经销单位销售发热、咳嗽药品，等等。

20日下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书记办公会议。随后召开省级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非典防治工作协调小组转为省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

4月21日，习近平同志深入杭州市防疫一线，先后来到小营街道老浙大直路隔离点、城站火车站、铁路杭州医院、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潮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武警杭州医院等处，察看疫情，检查各项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并充分肯定杭州市和省级有关部门的工作。同时，他反复强调“人民健康高于一切，领导

责任重于泰山”，“要做好预防工作，不让其他人感染”，“要全力保护好医务人员”。

从这一连串的事实和数据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紧急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说，当时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企业，从社区到学校，从地方到部队，全省上下紧急行动，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了严密有序的群防群控、联防联控体系，构筑了一道牢固的“防疫大堤”。2003年上半年，国内24个省区市、266个县和市（区）先后发生非典疫情，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327例。浙江省仅有4例输入性非典临床确诊病例，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二代传染病例、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发生交叉感染的省份。浙江防治工作多次受到来浙考察的中央领导和国务院非典防治工作督查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专家组等高度评价，称“浙江防治非典打了个漂亮仗”，为全国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浙江经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就提出要坚持应对疫情和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的要求，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早在省内出现非典疫情之前，习近平同志就多次强调“两手抓”的重要性。4月14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一方面要切实把非典防治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毫不放松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非典疫情发生后，习近平同志又强调：“坚持防治非典和促进发展两手抓，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5月22日上午，杭州市宣布西湖区蒋村最后一处非典医学留验点住户解除隔离，标志该市抗击非典战斗取得阶段性胜利。当天下午，习近平同志不失时机地召开全省“抗非典、促发展”电视电话会议，指出非常时期促进经济发展要有非常之策，非常之策在于非常认真地抓好贯彻落实，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加强分类指导，鼓励、引导和帮助企业积极应变。

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困难企业，指示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省政府下发《关于防治非典期间对部分行业采取扶持政策的通知》，决定5月1日至9月30日对全省饮食、旅店、旅游业、娱乐业、集贸市场、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及司机等企业和个人，实行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部分税收的减收、免收或减征、免征。省里还决定对旅游、宾馆、饭店的用电、用水、用气实行与工业企业同价的政策，对旅游业实行缓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动员商业银行及时对暂时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等。

他还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帮扶工作，强调要扎实做好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积极采取多种办法，尽力解决因疫情影响而下岗失业的人员和回乡后返城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对因防治非典导致部分企业职工和个体经营者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要及时纳入低保，切实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参保证工作，完善基层劳动保障工作网络，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深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研究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各级各部门大力扶助和推动下，浙江人敏锐把握市场需求，努力发掘新商机。全省许多中小型企业顽强拼搏，经过紧急改造，转产市场紧俏的产品，如服装纺织业转产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用品；一些传统产业趁势加快转型升级；电子商务的机遇因非典而放大，一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市场网上交易异常火爆，物流配送快速发展。非典还催生了专业消毒公司等一些新企业。全省上下努力克服非典疫情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到年底，浙江省经济社会各方面健康发展，国民经济主要增长指标继续在全国保持了领先地位。

采访组：在领导浙江抗击非典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思考与实践还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张曦：在浙江抗击非典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不仅在疫情高发期妥善应急处突，有序有力指挥，而且在疫情后期非常注意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高瞻远瞩提出要以此次疫情为鉴，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他指出，非典疫情灾害的发生，进一步暴露出浙江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表明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均面临着严峻挑战。非典疫情也进一步告诉我们，公共卫生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而是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2003年9月25日，全省抗击非典先进表彰大会暨全省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我省卫生工作历史上前所未有。习近平同志以《全面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加快推进卫生现代化进程》为题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没有卫生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建设，切实加强领导，把公共卫生建设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公共卫生建设的良好格局。

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实一件事，赢得万人心。他提出建设卫生强省的工作目标，推进公共卫生建设的各项工作，努力建设一个全覆盖、高效率、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从根本上构筑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防疫大堤”。

联系 17 年前的场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以赴，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使得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展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对卫生事业一以贯之的关注和重视，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全问题的关心与惦念。

采访组：听您刚才讲到习近平同志参加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的支部组织生活会，他是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的。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既自觉做到党对高级干部的各项要求，同时又按照中央对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的要求，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支部活动。当时，他的组织关系在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因此他每年再忙也要参加省委办公厅一年一度的总结表彰大会，并挤出时间参加综合一处的党支部活动。大家学习什么、讨论什么，他也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在浙江工作期间，特别是头几年他为尽快全面、深入掌握浙江省情，几乎天天带着我们跑基层，开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每天都与办公厅的同志们在一起。习近平同志的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律己待人的榜样！

2003 年 2 月 12 日，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参加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的组织生活。他一见面就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表达自己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这是一个组织观念问题。他说，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是党章的规定，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加强个人党性锻炼的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到所在支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首先必须摆正位置，处理好党内职务与普通党员的关系。即便有时因为公务关系不能参加支部活动，也要按规定请假。那天支部学习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办公厅年度总结表彰大会精神，习近平同志和大家

一起进行了学习，勉励大家要强强调研。

后来，习近平同志还多次参加综合一处党支部民主生活会，和支部其他同志交流思想、进行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大家交流思想和体会。2006年12月30日，他离开浙江之前最后一次参加综合一处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还是和以往一样指出：“今天我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我们支部的组织生活会。领导干部应该有普通党员的意识，过好双重组织生活。这次组织生活会还同大家的工作结合起来，研讨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这与抓党建促工作的要求也是相通的。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讨论和沟通，交流一些体会，共同推动工作。”他在会上与大家交流做好文字工作的体会，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领悟精神，讲究准确；二是要严谨简约，力求精练；三是要善于积累，学以致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始终装着百姓。在您看来，他在浙江工作期间都有哪些具体体现？

张曦：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有着最深厚淳朴的感情。他经常对我们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人民最可亲最可敬。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个有作为的人最高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追求。”

他第一次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之初，就提出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时刻牢记政府前面有‘人民’二字，始终将政府的工作目标定位在全省人民的利益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知民情、重民意、尊民心、惜民力、急民需、解民忧，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实利、求实效，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过去我这样要求自己，现在仍这样要求自己。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间，我一直将‘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多做有益人民的事’作为自己从政的理念之一，现在和将来我仍要这样做，请大家监督。”

2003年12月30日，他带着我们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说：“‘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牵动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他还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

在心上，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工作，努力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2004年1月8日，他在丽水调研时指出：“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谋民利、得民心的好事实事，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们的积极性，实实在在地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2004年8月6日，是杭州入夏以来的第31个连续高温日。当天上午，他冒着酷暑，到西湖文化广场建设工地，慰问在高温下坚持一线作业的民工。他与正在扎钢筋的民工一一握手，送上矿泉水和毛巾等防暑降温品，关切地询问民工施工、生活和防暑等情况。他来到民工食堂，关切地问：“天气这么热，民工兄弟吃得怎么样？”看到餐厅干净整洁，摆有10多种蔬菜和鱼、肉等，他询问工作人员：“每天都能有这么多菜吗？价钱贵不贵？高温天气民工出汗多，能不能多提供一点饮料和汤类？”工作人员回答说，民工一天花不到10元钱，就能吃饱吃好，汤是免费的。习近平同志又特别关照：“要确保饭菜卫生”，“多煮点绿豆汤”。从民工食堂出来，习近平同志径直走进民工宿舍察看。他一再叮嘱随行的施工单位负责人：“民工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我们更要关心、爱护和体贴他们。要合理调整作息时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高强度作业，确保民工健康，努力营造良好的施工环境。”

习近平同志心系群众、执政为民的作风首先源于他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告诫我们“要像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他多次情不自禁地讲起在延安插队时与群众打交道的一些亲身感受，也时常对我们说：“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对人民群众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基础，成为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不竭动力。习近平同志特别注重群众对干部的评价。他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满意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最好褒奖。2003年11月24日，他在《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一文中指出：“领导干部要想真正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一点‘影’、留下一点‘声’、留下一点印象，就要精心谋事、潜心干事，努力为人民多作贡献，而绝不能靠作秀、取宠、讨巧，博取一些廉价的掌声。”他还多次指出：“认真实施关系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树

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

习近平同志坚持把帮扶困难群众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他早年亲身经历过各种磨难，吃过各种苦头，正是这些艰苦岁月的磨砺，使他从内在朴素的感情上深深体会到困难群众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他经常对我们讲：“做好帮扶工作，关键是各级领导的心中要时刻装着群众。”2004年2月6日，他在省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真正了解广大人民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主动地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尤其要深入到困难多、群众意见多、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上访的困难群众。2005年2月3日，他在省委办公厅总结表彰大会上讲到：“做好信访工作，重要的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火热心肠。大部分到省里上访的人，最起码他自己认为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需要党和政府为他作主，帮助解决问题。这里的复杂性就在于，有的确实是有冤有苦；有的则是他自以为有冤有苦，实际上于理于法都不符。因此，我们的信访干部要怀着火热的心去接待信访群众，认真甄别，妥善处理。对那些真正有冤情的，要为民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对那些无理上访的，要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必要时通过执法部门来协助解决。”

习近平同志还格外牵挂贫困偏远山区的农民。2003年年底他到泰顺的考察，就是典型例证。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泰顺一直以来都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最薄弱的地区之一。泰顺的县情有几个特点：一是“最高”，县城海拔约500米，全省最高；二是“最南”，县域与福建交界，全省最南端；三是“最远”，十几年前汽车到泰顺据说要绕过999个弯，虽然交通条件极大改善，但仍是全省到杭州、温州最远的县；四是“最贫”，脱贫之前县城找不到一块足球场大的平地，一只青蛙一跃跳过三丘田，当时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为全省人均的三分之二左右。对于最穷最远的泰顺县的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时刻挂在心上。2003年12月10日到12日，他带着我们陪同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到宁波、温州考察。一结束，就立即从温州转到平阳、苍南等县，一直调研到15日。其中14日去了一直想去而未去成的泰顺。在开座谈会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下山脱贫是推进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务必抓紧抓好。在实施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好下山农民

的出路问题，让他们搬得下、富得起。

习近平同志讲过：在日常工作中，有一类干部“眼光敏锐，见微知著，‘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开展工作有板有眼，纵横捭阖，张弛有度，‘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展现出如此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以自身非凡的人格魅力、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心系群众的执政理念，使得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为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采访组：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在日常交往中是怎样与身边人打交道的？

张曦：习近平同志为人处事非常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平时，他常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心得体会和一颗平常心与大家谈工作、谈思想。他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和非凡的凝聚力，基层干部和群众同他一接触，马上会与他发生共鸣和互动，十分愿意向他掏心里话。

我先谈谈他与老同志的交往。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老同志，非常重视老干部工作。他刚到浙江后的头几天，白天及几个晚上都安排了工作。即便如此，从2002年10月13日晚到18日晚，他仍然挤出4个晚上看望了7位正省级老同志，认真倾听他们对浙江省情的介绍和工作的建议。他经常给我们讲：“老干部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的特殊群体。”“做好老干部工作，就是在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的工作”。“八八战略”中关于“发挥八个方面优势”的内容，就充分蕴含了习近平同志对历届省委、历任老领导历史贡献的由衷肯定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光大。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6个年头，每年都会出席正省级老同志座谈会、副省级以上老同志通报会、省直老干部迎春茶话会，走访慰问老同志，会见已故副省级以上老同志遗孀，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虚心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老年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到浙江不到3个月，2003年1月8日，他就出席了浙江老年大学新校奠基暨开工仪式，之后又两次在老年大学作形势报告。2003年11月，他在老年大学作报告，一开头就说：“这个报告会，原来安排在4月下旬，由于非典影响推迟了；今年的重阳节和老年节又适逢国庆长假；今天一是看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二是向大家通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可以想见，他在异常繁忙的工作中是如何挤出时间专程来作这个报告的。2005年11月2日，他到省委老干部局调研时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老干部工作，不仅要常抱敬老之心，还要善谋为老之策，多做助老之事。必须始终坚持服务为先、服务为本，明确工作重点，落实各项措施，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老干部，思想上关心老干部，生活上照顾老干部，使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不断提高对老干部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这几年，我参加省里一些老同志的活动，很多老同志会不时讲起当年习近平同志对他们的关心。习近平同志做事总是“有头有尾”。2007年3月25日，中央宣布习近平同志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决定后的第二天，他又去看望了在浙的正省级老同志，与他们一一话别。

习近平同志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与许多老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习近平同志非常敬重这些老同志，只要有他父亲的战友或战友的遗孀来浙江，他都会去看望。2003年8月26日至28日，他率代表团到青海西宁等地考察，在满满的日程安排中还是抽出时间，请青海的同志陪同他专程探望父亲当年的老朋友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老母亲。

对于曾经和他一起并肩奋斗共事过的知青、同学、战友、同事，习近平同志十分珍惜与他们的情谊。在浙江期间，每当有陕西、河北及福建等地的同志来调研或看望他，无论他工作多忙，都会抽出时间见他们。有时白天没空，就赶在清晨或晚上去见。在看望他们的来回路上，习近平同志会情不自禁地与我们讲起那些难忘的往事。他很念旧情，同时又坚持原则。他提醒我们：接待时要有原则，万一有提出不合理要求的，要做好工作，决不能碍于我的面子随便答应。回想当年，其实我们从没有碰到过他提醒的这种“万一”的事。因为凡与他工作或交往过的同事、朋友，谁都知道他待人真诚，但也从不违背原则。

习近平同志对待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是非常真挚的。彭丽媛同志在北京工作，偶尔才来杭州，省委办公厅就成了习近平同志的“家”，我们几乎天天都与他在一起，他总是那么亲切地关怀大家。下基层时发现有同志生病了，就嘱咐及时休息，回到驻地还关心地问他吃过药没有。在我印象中，习近平同志除了在大会上严肃要求大家之外，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地批评过某个人。跟随他工作的日日夜夜，虽然任务繁重，标准很高，但大家都觉得很快乐。

采访组：浙江大学是习近平同志的联系单位。您调任浙大党委书

记后，他曾在浙大主持了一次省委常委会，请您讲讲这段经历吧！

张曦：就我所知，解放后在浙江省委常委会的“会议史”上，极少有在省委大院外召开常委会议的。习近平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在外面召开过两次。一次是2004年，为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决策，在宁波召开的。还有一次就是2005年9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现在的浙江大学是1998年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而成。中央和省委一直对新浙大寄予厚望，为使浙大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国家和省里在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2004年7月，浙大原党委书记张浚生同志因年龄原因退出领导岗位，组织决定调我到浙大工作。调任前，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你到浙大先做好调查研究，有困难找我，条件成熟时我到浙大开一次会。”我调到浙大后，立即深入各院系各部门调研。几个月下来，对浙大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2005年9月23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带领全体省委常委及相关人员来到浙大。这是他第十四次来浙大。大家首先参观了浙大“西迁办学历史陈列展”。习近平同志走到浙大西迁广西宜山的图片前，停住脚步，对各位常委讲，当年国难当头，国学大师马一浮写出“树我邦国，天下同”的校歌歌词，很有深度；看到浙大师生协助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至贵州地母洞的图片前，他又停下来给大家说，他曾在报纸上读到过详细的事迹，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浙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参观浙大学者学术成果的“浙大文库”时，他介绍了词学大师夏承焘的籍贯，还讲了著名敦煌学研究学者姜亮夫的成就；步出文库时，他又对身边的同志说，百年浙大“桃李芬芳”，强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参观之后，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他先是听取学校的汇报和各位常委的发言，然后发表讲话。他说，浙大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百年高等学府。在100多年的历程中，浙大大力发扬求是学风，切实履行育人责任，桃李芬芳、硕果累累，不愧是科学精神的弘扬者、优秀人才的培养者和人文精神的薪火相传者。四校合并以后，浙大很好地把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学校的教学、科研、改革、发展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各项办学指标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稳步迈进。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教育部都对浙大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省委省政府对浙大的工作也是满意的。

习近平同志讲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在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具有艰巨性和复杂

性。我们既要看到内在基础坚实、外部条件较好、面临机遇难得、发展前景很好，也要看到挑战依然存在、困难还有不少、任务十分艰巨。浙大必须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目标和“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总要求，锁定目标不动摇，加快步伐不停顿，扎实工作不松劲，坚定不移地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他展开讲了四个问题。首先，要育人为本，质量立校。要把“育人”作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把“培养什么人”作为根本性问题，把“如何培养人”作为高校的永恒主题。要牢固树立“学校教育、育人为本”的指导方针，把育人放在高校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融入各个方面，灌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各个环节，努力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

第二，要师资为基，人才强校。浙大提出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从一定意义上，重点是“强师”。一流大学的标志，不在于一流的大楼，而在于一流的大师。要坚持引进和培养两手抓，用超常规的办法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大师和重点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建设一批特别能战斗的创新团队和优秀群体，特别是要加大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

第三，要发挥优势，特色兴校。浙江大学生于浙江、长于浙江，浙江的自然环境、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俗民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无不对浙江大学形成特色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为浙江大学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带来了良好机遇，可以说这也是浙江大学的一大优势所在。要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学科优势，既包括通过推进各学院、各部门开放式办学和开放式科研，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优势互补，从而发挥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又包括在文史哲或理工农医等一些学科上达到国内顶尖，甚至世界一流。

第四，要服务社会，合作办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为浙江发展服务，是完全统一的。“立定脚跟，背后青山飞不去”。只有更好立足浙江，才能更好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浙江全省上下在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为浙大显身手、作贡献、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众多的机会。

会议快结束时，习近平同志明确表示，省委和杭州市过去制定的支持浙大的

政策不变，对于省内其他高校在高教园区享受的优惠政策也同样给予浙大。相信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省委省政府和杭州市委市政府对于浙大的支持力度将不断加大。

那次省委常委会后，习近平同志又以大量具体实在的措施支持浙大发展。学校党政办公中心和各学院相继搬进成为主校区的紫金港，西区成功征地 2660 余亩，为浙大的融合发展发挥了更大作用；学校先后建成 84 万平方米的教职工住宅，大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居；杭州市给予浙大在征地补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一一到位，学校发展迈入新的阶段。

在浙大人看来，这次省委常委会，是省委领导集体的现场办公会，更是一次加快推进浙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动员会和誓师会。会议结束后，全校上下立即召开各类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校班子和广大师生纷纷表示，习近平同志为浙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绘就了美好而又清晰的蓝图，我们一定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2007 年 3 月 24 日，中央宣布习近平同志调任上海市委书记。26 日，习近平同志给浙大写了一封满含深情的信。他高度肯定了这几年浙大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又写道：“浙江大学是我的联系单位，我始终牵挂着浙江大学的发展和进步。我每年都会到校园里走一走，与师生们聊一聊。浙江大学对我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在此谨表感谢。因日前中央决定调我到上海任职，未能与广大师生见面话别，借此表示问候。”最后他又热情地勉励我们：“祝愿浙江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走进高校及党校作报告。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对高校和党校工作非常关心重视，不仅经常到学校考察调研，更与师生、学员深入交流。记得他刚到浙江就给我们讲，每年争取到大学或党校作一次报告，时间可以安排在开学初。从 2003 年到 2007 年，习近平同志连续 5 年为高校和党校师生作过 5 场报告或讲话，每一次都是高度重视、充分调研、精心准备，报告会前还会通过分管省领导、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以及学校等多个渠道多种途径，详细了解高校及党校的最新动态和师生关心的问题。

第一次是 2003 年 9 月 28 日，新学期开学不久，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大学玉

泉校区，与同学们交流国内外形势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特别详细介绍了“八八战略”。报告会快结束时，他说，浙江是个干事业的地方，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也是人才成长的好地方，为大学生施展才干、实现抱负提供了广阔舞台。很多同学听了这场报告，都萌生了毕业后留在浙江发展的想法。

第二次是2004年9月7日，习近平同志来到省委党校，在秋季开学典礼上以“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主题发表讲话。当时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严肃处理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建设问题，轰动全国。他针对一些干部中出现的畏难情绪指出，领导干部追求和创造政绩，应该符合实际、遵循规律。要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一系列重要举措，切实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要坚持局部与全局相结合，巩固和发展全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就全国而言，浙江是局部，浙江必须服从全国这个整体；就浙江而言，各市县、各部门又是局部，要服从全省这个整体。他通过这场报告，进一步引导来自全省各地的许多县（处）级干部学员认清形势，统一思想，从而振奋精神，迎难而上。

第三次是2005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省人民大会堂围绕“理想·价值·人文精神”，作“同大学生谈人生”的主题报告。他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家庭的期待，希望同学们珍惜校园的学习和生活，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将来真正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他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以精辟的理论阐述和真切的人生感悟，语重心长、深入浅出地给大学生传授做人的根本道理，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和深刻的人生课。

第四次是2006年9月27日，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以“继承文化传统，弘扬浙江精神”为主题为师生们作形势报告。他指出，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浙江文化精神是浙江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浙江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浙江精神是在浙江这块丰厚土地上生长、发展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浙江人共同奋斗的结晶。作为浙江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求是精神”，是百余年来浙江大学办学理念的浓缩和凝炼，是浙大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归依”崇高追求的高度概括。“求是精神”不仅是浙江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省教育科技战线乃至全省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发展阶段，要继续

发扬光大浙江精神和“求是精神”。

第五次是2007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以“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做践行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带头人”为主题作了报告。根据他的指示，之前省委专门下发通知，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出部署，省委常委会在春节前又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全面检查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整改措施，明确努力方向，推进省级领导班子的作风建设。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省里又全面部署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这次在省委党校作报告时，习近平同志结合个人的学习、思考和体会，要求领导干部经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住自己，也要在日常小事和生活细节上守住底线，确保“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切实做到慎独、慎欲、慎微、慎交友。这场报告给党校老师和学员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次报告会结束后，习近平同志都叮嘱我们，一定要了解老师和同学们的真实感受，要通过各种方式听取大家的反映，广大师生提出的好建议和想法要吸收到制定高校的政策中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作报告是什么样的风格和特点？

张曦：习近平同志学养深厚，视野开阔，作报告往往通过生动的故事把问题讲清讲透。他常常即兴发挥，既讲古人的故事又讲当代人的故事，既讲外国人的故事又讲中国人的故事，既讲别人的故事又讲自己的故事，每次报告都是语重心长，娓娓道来。我就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2005年为高校师生作报告的情况。

在与大学生谈人文精神时，习近平同志谈到《大学》《孟子》《资治通鉴》《思想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著，讲到列宁、斯大林、车尔尼雪夫斯基、爱因斯坦、曹操、杨万里、狄仁杰、三刘（刘邦、刘秀、刘备）、郑和、林则徐、李鸿章、梁启超、鲁迅、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等中外名人，讲到项羽和刘邦争霸的故事，讲到钱塘堤官和定海三总兵事例，讲到浙江大学西迁的艰苦历程。他用历史人物的故事勉励学生们要从年轻时起培养一种人文情怀，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一个“大写的人”的概念，说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最卓越的教育家之一，曾两度担任北大校长，毕生倡导美育，主张文理沟通、“五育”并举。毛主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心目中的培养目标，就是一种“大写的人”，一种全面发展的有着健全人格的人。习近平同志希望当代大学生也要做这样的“大写的人”，当代育人者也要

把培养“大写的人”作为立学目标。

在鼓励大学生培养宽容精神时，习近平同志讲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故事。他说，记得《资治通鉴》里记载，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娄师德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著称。有同僚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后来狄仁杰升了宰相，也有看轻前任的意思，瞧不起娄师德，想把他排挤出朝廷，娄师德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就问狄仁杰：娄师德有德才吗？狄仁杰说不知道。武则天又问：娄师德有没有知人之明？狄仁杰说不见得。武则天就说，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举荐的。狄仁杰听了惭愧不已，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后来也成了一代名相。

在鼓励大学生应该在实践中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时，习近平同志讲到，宋人杨万里有一首登山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他说，人生在世，就如登山，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面临各种考验。特别是对大学生来说，既会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喜悦和鼓舞，又会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焦虑和迷茫。有的人在迷茫中走向邪路，有的人在挫折前失魂落魄。因此，关键要有一种信念来支撑自己、把握自己，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再好的环境照样会走弯路。

在讲到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共同理想时，习近平同志讲到，相传释迦牟尼曾问他的弟子：“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弟子们面面相觑，答不上来。释迦牟尼说：“把它放到大海里去。”个人再完美，也就是一滴水；一个民族的理想就是汪洋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谈到责任感时，习近平同志要年轻人对自己负责，对自己怎样成人、成才，做人、做学问负责。他引用梁启超的话勉励同学：“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于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他像家长一样，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要对亲人负责，懂得怎样去关心、爱护自己的亲人，懂得怎样去减轻和分担父母的种种负担和忧虑，懂得怎样以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来增添亲人的喜悦与家庭的欢乐，当时很多同学听了都非常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作为浙江省委书记，在与大学生谈“弘扬浙江精神”时，一定有深刻独到的理解。请您也介绍一下2006年那次形势报告吧。

张曦：习近平同志 2006 年为浙大师生作的那场形势报告，简直就是一部关于浙江文化简明扼要的生动教材，让人听了能够自然生发出对浙江的热爱。

在谈到浙江文化精神时，习近平同志深有感触地说道：“浙江的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根本的还是人的因素，确切地说是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浙江文化是引领和推动浙江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这也是我到浙江工作后体会特别深的一点”。他希望同学们对浙江文化能有深刻的了解，他在报告会的开头说道：“在座的各位同学，有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人，有的是从外地考到浙江的大学来学习。不管是不是浙江人，现在浙江的大学里上学，很多人都会向你了解：‘浙江怎么样？’这一句话很简单，但要回答好这句话，就不一定容易，因为从你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你对浙江到底了解有多深。”习近平同志给大家讲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小故事。如在讲浙江人兴利富民始终坚守讲义守信的品行和操守时，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浙江人笃信‘义利双行’‘义利并立’‘以利和义’的信条，形成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儒商文化。全国闻名的百年老店胡庆余堂，大堂内挂着的是‘戒欺’的牌匾，告诫员工牢记诚信经营；大堂外挂的是‘真不二价’招牌，接受客户的评定监督。浙江工商业者一向以其勤勉诚信的优秀品行，开银行，办企业，建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企业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宁波帮创下了 50 个全国第一的骄人业绩，湖州商人中产生了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狮狗’的工商巨子。”

在讲浙江人谋发展求富强始终不忘和谐发展时，习近平同志说：“中华民族向来有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共同情怀，与人、与己、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进的发展理念在浙江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我们观览河姆渡原始艺术中那些驯服的猪羊、矫健的飞鸟、颗粒盈实的稻穗、生机蓬勃的花卉、如火如荼的太阳等纹饰、雕刻，不难感受到河姆渡人热爱自然、赞美自然和融入自然的美好情愫。白蛇传中人妖爱情的感人，梁祝故事里双人化蝶的美幻，无一不是这一情怀的民间表达。浦江郑氏义门十五世同在一堂，历宋、元、明三代，长达 330 余年，孝义持家，名冠天下，被誉为‘江南第一家’。这可以说是人我共生的典型注脚。现代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马寅初高度重视人口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大声疾呼要根据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其实质也是追求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讲到浙江人“刚正坚贞、坚韧不拔”时，习近平同志说：在国家危难、大

厦将倾之时，总有刚正坚贞的浙江人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以身殉国：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忠臣方孝孺不畏强权；名将戚继光勇抗倭寇；大儒刘宗周绝食殉国；张煌言抗清不屈；“定海三总兵”葛云飞披甲上阵；更有“鉴湖女侠”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骨头最硬的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对青年却“俯首甘为孺子牛”。

在谈到浙江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时，习近平同志说：善于用文化的内涵包装和经营产品，是浙江人以文化的方式发展经济的首要特征。比如，浙江人善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柑橘节、杨梅节、毛竹节、丝绸节……产品是如此，城市也是如此。“经营城市”的理念在浙江已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规划建设，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拓展等更为复杂、更为深奥的内容。在文化兴市的理念下，有了乌镇、南浔、西塘等“江南水乡”的韵味，有了临海“江南长城”的复古，有了绍兴、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兴盛……也有了旅游业带来的成千万上亿元的收入，以及由其凝聚起的“人气”和经济景气度。

再如，讲到诚于合作、敢于闯荡、善于发展的“浙江人经济”时，习近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伊始，浙江人做生意四海为家，坚信生意无地域，市场无疆界，只要有钱赚，管它东南西北中。于是乎，大江南北，到处活跃着新时代的浙江人。如人所说：“有井水的地方就有生意可做，而有生意可做的地方，必有浙江人”；“世界上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有市场”。在巴黎的“温州街”，在13区至14区住的华人大多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当地的“公务员”也不得不说温州话。有人将这个现象称为“浙江人经济”。

习近平同志通过上面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给即将走上人生新征途的同学们讲了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作为一个普通的经历者，因为你有过在浙江上学的经历，将来许多人还要在浙江创业和生活，就起码要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民生活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一名大学生的要求，就是既要读好课堂上的书，又要读好社会这本书，要了解浙江、热爱浙江，进而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激发起应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省委书记，听众是大学生，是基层干部，他是怎样拉近与听众距离的？

张曦：坦诚相待，推心置腹，是习近平同志报告的鲜明特点。他没有丝毫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总是能一下子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有一次，他在报告中随口讲出当时高校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短信发到欠费，逃课成群结对，恋爱谈到反胃，考试基本不会，听得全场师生都笑开了。在和大家谈人生问题时，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说教、训话的，而是想作为同学们的长辈，作为一个过来人，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同大家交流、共勉。”“给自己出了这个题目之后，我也在深入地反省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觉得：虽然人生道路很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虽然人生问题很复杂，但要害在于把握住最基本的东西。每个人的人生各有不同，但不同的人生，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把握的，比如理想信念、价值观、责任感、人文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大学生应该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目标”时讲起自己的故事，说：“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勤奋的。我觉得世界上少有特别聪明的人，成功的经验就是笨鸟先飞，勤能补拙。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甚至比你们还小、只有15岁时，就到陕西延安地区下属的一个山沟沟里插队落户。那个时候政治决定一切，而我在政治上已被判‘死刑’。……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自暴自弃。虽不得兼济天下，也要独善其身；虽无以治国平天下，也应修身齐家。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为此，我在放羊时带上书，在窑洞的油灯下埋头苦读，甚至还涉猎军事书籍，早上起来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我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当年所学的很多知识直到今天还管用。”

在谈到“培养吃苦的精神”时，习近平同志说，浙江自古是卧薪尝胆之地，人文荟萃之乡，浙江人人不怕吃苦。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就曾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他还说自己也是苦出身，对浙江人不怕吃苦的精神感同身受。

在鼓励大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时，习近平同志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长辈的影响，家里老是吃面，以至于家里的厨师都被人笑成是面条师傅。后来，他在农村也学会自己揉面。他说，人进入社会的过程就如同揉面粉的过程。面粉加上水揉一下，然后一捏，很容易散开，但你继续揉，揉了千遍万遍后，它就再也不会散开，你给它拉长了，它也不会散架，反而变成了拉面，这是因为它有了韧性。人走上社会，就像面粉一样被社会不断地搓揉，刚开始可能会散架，

但你信念坚定，受得了压力，越揉反而越韧，最后变得非常有韧性，再也不怕搓揉。

有一次，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讲到一位河南籍的农民工李学生，在温州务工期间勇救儿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评价李学生是一个作为平凡之人而作出不平凡壮举的英雄，他见义勇为的表现不是偶然，是做人的理想和价值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他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农民工，但却是一个高尚的人。习近平同志借此勉励青年学生把自己的理想内化为心灵的坚守和生活的航标，树立并实践高尚的理想信念，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在讲到交朋友时，习近平同志告诫领导干部要择善而交，多交一些益友、诤友，而不是酒肉朋友。习近平同志说起在福建的时候，台商很多，他就经常跟领导干部讲，要亲商爱商，但要注意分寸，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慎同餐、慎同行、慎同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他还说，领导干部要学会拒绝，学会包公的“黑脸”，不要被人情和面子所累，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对于年轻的大学生，习近平同志希望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他讲到在延安农村插队时与群众打交道的一些亲身感受：“我的成长始于陕北。插队时离群众最近，7年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也是同样原因，1982年，我主动要求从中央机关再次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我说要像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他说，自己最深的一个人生体会就是，最难时最大的靠山是人民群众，一是不信邪，在你最需要时伸手援助；二是教你做人做事长见识，实事求是精神来自于群众，看干不看说；三是具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做事没有浮躁之心。

几天前，我和浙大的一位年轻老师交流，她说最近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忍不住感动得落泪。巧合的是，她在2005年正读研究生，那年6月聆听过习近平同志的报告。回忆起当时场景，这位老师说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身居要位、日理万机的领导竟有如此之高的人文素养，大量的故事、大量的数字信手拈来，演讲时基本脱稿；二是没想到他列举自己的生活经历如此坦率，小小年纪下乡锻炼，但不随波逐流，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目标。

俗话讲：“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几年过去了，习近平同志当年那些朴素话语、殷殷期望，犹如涓涓细流，始终流淌在浙江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来源：学习时报，2021-03-08）